



## 记忆 115 期

2014年6月30日

## 目 录

### 【专 稿】

老 田 毛时代的中国社会分层以及文革所揭示的官民矛盾——与李逊商榷

### 【北京文革】

胡宗式 北京文革两派斗争简史（三）

12. “5.16” 的出现

13. 中学及军事机关

14. 陈伯达 6.5 讲话 天派地派名称的出现

### 【评 论】

朱晓茵 去伪存真——王友琴关于刘秀莹老师的不实之词

### 【学苑新语】

阿 秋 理想的陷阱——读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 【纠错答案】

曹佐燕 “谭厚兰被迫害惨死”之说的八处错误

### 【述 往】

刘秀莹 我的母校师大女附中

孙丹年 我的父亲母亲——一个右派女儿的回忆

津 平 夫妻年年盼鹊桥——忆我的同事康翊和傅凤华

朱 特 插队的那些事（一）——从大槐树下出发

### 【资 料】

胡启立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报告（1966年6月8日）

胡启立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讲话（1966年6月19日）

### 【读者来信】

1. 樊建政纠正 114 期来信之误

2. 章铎谈《北京大学大事记》的出处及114期的两处误植

### 【版权声明】

## 【专稿】



老田，民间学者，2002年进入文革研究领域，主要是通过口述史路径进行研究。2006年曾经进行阶段性的文革历史学习总结，为此写过提纲性的论文《作为大民主的文化大革命：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见互联网）。

## 毛时代的中国社会分层以及文革所揭示的官民矛盾

——与李逊商榷

老田

阅读李逊的论文《革命名分的诱惑》（下称“李文”），有很多感想。这篇论文从经验感受进行提炼，把“体制身份”和“政治身份”作为毛时代社会分层的依据。对于毛时代个人如何完成积累政治资本的过程，李逊根据自己对于上海文革运动的研究，提炼出“革命名分”的概念，并把这个看作是许多人参与政治活动的关键要素。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名分”概念的提出是一种深刻的学术提炼：超越各种社会现象的感性材料，提升并创造一个学术分析的工具，从而去芜存菁，剥离一些个人化的感受和偏见的影响。读了这篇论文之后，我自己也对照反思了对毛时代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看法，有几点感想，写出来相互交流。

### 一、对于社会分层的看法

个人对感性材料进行概括提炼，除了自己的思考之外，也许需要参考旧有的学术积累，与李文的思考相关的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理论，这个方面的学术积累都在“社会学”学科领域之内。美国社会学者赖特·米尔斯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通常与他持有的三种资产有关：政治资产、经济资产和文化（技术）资产。马克斯·韦伯则认为，一个人所掌握的政治权力、经济资本和社会声望的多少，是其处于何种社会阶层的依据。对照李文所强调的“政治表现”和“革命名分”，

可以视为政治资产的积累过程；而一个人处在何种所有制企业内的待遇差别，与西方国家企业在市场上有无竞争优势和垄断地位影响其员工收益的差别有相似性。<sup>1</sup>

李文说：“（体制身份和政治身份）这两个体系的等级身份，完全重构了中国1949年后的社会结构。不仅破坏了传统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换和勾连，也破坏了每个个体对身份自我转换的权利和能力。这样的制度，将各种不同的阶层群体和政治形态，隔离在各个层次等级，不许横向联系，以方便执政者分而治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描述，这么说有依据但并不充分。对照传统时代，毛时代农民进城数量肯定远超从前，这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相匹配的历史现象。至于隔离的结论，对于那些受到歧视的群体来说，应该是成立的。但是，说一个社会隔离大多数人，下这样的判断，需要仔细斟酌。毛时代的政府和国营企业占据全社会，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起作用，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过分强调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消极面并用贬义词加以界定，虽然有着经验证据，却不一定全面和准确。对于有着毛时代生活经验的人来说，与49年之前和今天的中国相比，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或者说社会分化，到底是强化了还是缩小了？经得起检验的结论，对各种成见和个人感受均要有所超越。

还有，毛时代确实有一部分人丧失向上流动的机会，例如黑五类出身、右派等，他们入团、入党、提拔、升学、参军的机会要少得多。但是，这只是意味着占整个人口中间的少部分人被剥夺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并不意味着这个群体之外的人群例如“红五类”就自动有机会上升，机会多的还是李文所强调的干部子弟。所以，分析社会分层，把黑五类等各种受歧视的群体突出出来进行对比，会导致一种无意识中的观察样本的偏移：选择在“有机会”和“无机会”群体的边界线附近进行观察，这个边界线只能识别什么人受到排斥，但是不能观察到到底是什么人得到向上爬的机会这个真正的“分层”和“社会流动”的依据。可能的现实是：当时的社会中间有5%左右的人口（例如地富反坏右）被剥夺向上流动机会，还有5%左右的人口例如党团员、劳模、积极分子处在向上流动的优先位置。但是，即便是党团员这种处在“优先位置”的候补人群中间，最终可能也只有五分之一

---

<sup>1</sup> 对社会分层较为综合的介绍，格伦斯基《社会分层》一书的相关章节值得一读，这本书的网络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6727726.html>

或者更少的人最后实现了向上流动。所以，观察社会分层和流动，首先应该在“有机会”大数样本中进行抽样观察，然后再观察这些人中到底是什么人通过什么样的门路最终实现了向上爬。而文章强调阶级斗争和运动对象，只能识别出谁被剥夺了向上流动的机会，由此造成了新的歧视和政治不平等。而社会分层和流动问题要通过“谁得到了机会”的分析来说明，阐明“谁失去了机会”则说明不了这个问题。

对于毛时代的社会流动和分层问题，李文比较强调“隔离”和个人对于社会流动的无能为力，强调制度或者体制的分配作用，这从经验来说有其依据。但仅仅从这里出发还不够，需要对照传统时代、西方国家的现实和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理清认识，才较为全面和准确，从而得出更加靠得住的分析和结论。例如，李文强调毛时代工人很难改为干部身份，与西方国家企业和今天中国企业的现实对照之后，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毛时代的干部政策比较强调从工农兵这样的第一线人员中间提拔干部，对照今天中国和海外的企业，蓝领工人基本上是不可能被提拔到高层管理岗位的，也不可能进入政府部门任职，这样的职位基本上属于在大学这样的标准白领生产线上加工过的成员。今天不仅政治局里头不会有陈永贵、吴桂贤，而且厂长级别都不可能出现陈永贵、吴桂贤。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显然没有纳入对照和思考的范围，因此，这样的思考和提炼就不无疏漏。

至于说到“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的问题，在农村还要加上“民办教师”“赤脚医生”这样的技术职位，这在文革中晚期比较多。这属于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李文在不经意之间混淆了。毛时代强调缩小“三大差别”，强调干部群众化，不脱离生产劳动，群众组织头头参加革委会还要求是“半官半民”，这种政策当时宣传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事物，是逐步告别传统的等级社会的方法。这与朱镕基任上扶持“中产阶级壮大”的政策截然相反，可以说是一种“中产阶级最小化”的政策。李文从个人经验角度，观察到这一政策的后果是“工人很难转为干部身份”，这个很准确。但是，这是否构成一种隔离则很难说。这恐怕也等同于改革初期在工厂用工制度中那种“新人新制度”“老人老制度”的妥协策略——在不剥夺正式工利益的情况下对新增员工采用合同工制度，而文革时期则对原先的干部群体不剥夺他们的干部身份和待遇，而对于新干部则强调不改变原有的劳动者身份。工厂用工制度改革的结果，是逐步增加合同工的数量，在一个

时间段之后就没有了“正式工”而实现单轨制。文革是否在一个时间段之后彻底没有了“正式干部”，因为相关干部政策随着文革被彻底否定而终结，就无法验证了。尊重既得利益显然是一种降低政治不满和反抗的权宜策略，结果当然在客观上就造成两种身份的对照，而且这一政策还使得转换干部身份的难度增加，因为新增干部的指标很少。

毛时代“最小化中产阶级”政策的后果，当时的说法叫“缩小三大差别”——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三大差别的缩小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影响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普通民众减少了向上爬的必要性，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李文指出的，贫困农民群体中首次普及了低水平的受教育机会和医疗保障；换句话说，中产阶级群体的缩小使得民众获得“廉价政府”和“廉价福利”。为什么要等到文革晚期农村才真正普及小学教育和合作医疗？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小学教育和合作医疗都依托“公社三级体制”来运作，但是，为什么要等到各级教育和卫生部门无法履行权力、公社体制确立十余年之后的文革晚期才得以实现，这里头的奥妙不少。可以追问一下：教育医疗等管理部门的存在与廉价服务供给的不足之间有什么关系。

从长远的历史阶段进行对照会发现：王朝末年统治阶级人数增加和单个统治阶级供养水平上升，综合后果是逐步超过底层的最高供养能力，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关键。毛时代特别是文革晚期的制度创新是否属于“缩小三大差别”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创造廉价政府和廉价公共服务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去年中国财政支出超过13万亿元，人均负担很高（每个城市就业人口人均税负超过2万元），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不怎么样，这实际上是政府形象下降的原因之一。从长远来看，过高的人均税负和过少的公共服务，会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其实，对于穷国或者穷困阶段的经济体而言，中产阶级的多寡及其经济状况的高低，实际上是与底层的负担水平呈因果关系的。毛时代中国工业化水平很低、农业总产出还不能保证全体国民的温饱，中产阶级的人数及其供养水平尤其与底层社会的负担轻重关系密切。抛开“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高调，还有一个极为现实的考量：社会上层所能提供的服务与其向底层索取的经济资源的对比关系，这是中国两千年治乱经验和政治智慧的核心内容。这可能意味着，对中产阶级成长的宏观学术分析，以及观察一个人为中产阶级地位奋斗的困难程度的微观体验，

都需要加上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所处的时间段”的检验尺度。

## 二、把“保守派思维”和“造反派思维”结合起来思考

我个人觉得李文的思考中，还是有一种“保守派思维”在起作用。这种思维的特点是，无视“当权派+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所结成的政治同盟对政治生活的异化改造，把官场中间的机会主义行为过于简捷地与制度功能捆绑在一起。例如说：“所有这些政治等级身份，实质就是由执政党对社会进行甄别，考察对革命的忠诚度，制订出每个个人在阶级斗争社会中的政治位置，以此建立严格的政治秩序。文革前的中国，本质上是个身份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为了达到高度统治的需要，执政党以阶级斗争为纲制造政治等级，对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分层再分层。”好像不这么做就不行，这个说法恐怕欠妥。今天回顾，我认为绝大多数此类做法都不是建立秩序所需要的，仅仅与干部如何分配稀缺的“向上爬”机会有关。很多所谓表现“忠诚”，也不是对于政权、政党乃至制度，而仅仅是对于官员个人的忠诚（甚至这种忠诚都是有疑问的），甚至是对官员个人进行“逢迎吹捧拍”而已，以此得到入团入党提干的机会。也许值得提一句，当官场中间“逢迎吹捧拍”的语言成为下级对上级的主导交流方式之后，不仅“长官意志”会成为官场准则，而且也减少了获得执行政策所需的准确信息并修正错误的可能性。

文革初期，不管是工作组领导“斗黑帮”还是“反干扰、抓右派”，不仅建立不了“严格的政治秩序”，而且还在干部和群众之间激起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意识。王光美在清华的做法，虽然与刘少奇在1947年土改时期的“搬石头”经验一致，但绝不是建立秩序和制度的需要。但是，王光美却得到大量官场的当权派和民间的亲体制力量（主要由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群体构成）的追捧跟随。没有这两种人群的无条件追随，不管是第一步的“反蒋”还是第二步的“反蒯”，王光美根本就玩不转。但这种现象恰恰是政治异化程度很高的表现，就像是后来造反派所批判的：走资派鼓励奴隶主义，培养那种“对上是奴隶，对下是奴隶主”的投机成性的“奴才”。这种现象的普通存在，恰好与毛时代从基层提拔干部的制度相勾连。如果干部不是掌握着从基层选拔积极分子、党团员这样的培养对象的权力，就不足以鼓励那种毫无节操的投机分子来顺从自己的意志，哪怕这种意志

是极端错误和有害于秩序建立和制度运行的。换言之，坏干部和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群体所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之所以得以成立，是因为干部掌握着稀缺的“向上爬”机会的分配权。也正因为如此，评定“名分”的权力足够秘密，才能够不受质疑，更好地实现由干部垄断。

这里对照一下“造反派思维”，可能会更全面一些。在造反派看来，当权派和马屁精结成的同盟的所作所为，不能与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进行捆绑，在共产党当权派（包括马屁精那样的亲体制力量组成的保守派）与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之间要进行分割。当时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文革初已调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仍然遥控湖北文革运动），因创造性地执行“资反路线”，明确提出“引蛇出洞，秋后算账，枪打出头鸟”，因此被造反派定性为“三反分子”——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不让王任重再有“扯大旗作虎皮”的机会。这个“三反分子”的罪名有一个功能性作用——彻底剥夺一个官员拿共产党意识形态、政权以及制度的合法性来掩盖自己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阶级分析法的引入，本身就有拿掉权力精英阶层身上各种政治或者非政治光环的作用，剥离掉那些与官位相关的光环。以此而论，反右扩大化实际上就等同于文革时期定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可以而且应该进行批判的。这个区分意味着，要把政权、体制或者制度，与制度的代理人（各级当权派）的机会主义行为<sup>1</sup>进行区分。真实的状况和学术分析，应该在两种思维的过渡带去寻找立足点，既不是简单把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与制度捆绑在一起，同时又要正视各种机会主义行为与制度的内在勾连。

### 三、文革揭示出来的官场机会主义行为

官场中间的机会主义和市场中间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样，都是难以避免的现象，在做分析的时候，要谨慎处理。对官场和政治生活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如何看待，是学术分析的一个难点。就政治实践而言，如何缩小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

---

<sup>1</sup> 对于官场和市场中间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一些表现和初步分析，可以在百度文库中间搜索到，地址：[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Jmvo63ssh-g50ooQx6zE9Julle2M16ELtIpLqT8ZY00gVRAa5fcEpmTBF1Xhyx F4BxvvoXuIVb0X0\\_E3KaNk\\_](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Jmvo63ssh-g50ooQx6zE9Julle2M16ELtIpLqT8ZY00gVRAa5fcEpmTBF1Xhyx F4BxvvoXuIVb0X0_E3KaNk_)

应该成为每一种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从实践到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哲学中的实证主义、政治学中的功能主义方法，都曾经被批评为“过度肯定现实”，缺乏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官场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广泛存在，一方面是官员的自利动机，一方面是客观条件的容许程度（这与权力得到监督的难度成正比）。就每一个社会而言，社会流动机制或者说谁优先得到“向上爬”的机会，是一个社会最为关键的激励机制。奖优汰劣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把这个激励机制与个人的逐利动机结合起来，去引导人们的行为和努力方向。奖优汰劣按照制度去执行，让那些应该受到奖励的得到奖励，同时诱导别人也这么做，这才是一种制度或者秩序得以稳定运行的正当机制。对于官场而言，那种坏干部往往喜欢提拔“俯首帖耳、听话出活”的顺民，并且通过这种机制去识别谁对自己忠心，这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建立“个人信任关系”的人脉网络来替代制度和政策规定的选拔标准。这是“党同伐异”的需要，同时也是权力资本经营逻辑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这样的选拔后果是“裙带关系”和“山头主义”盛行。这种选拔方式内在地筹组一个“上下其手”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在这个网络中间投入并积累“社会资本”。不要说共产党政权，这样的做法就是在封建时代也没有合法性。这样的机会主义行为却有着稳定性，穿越历史和各种社会制度去顽强地表现自己。从任何意义上说，机会主义行为都是对于制度和秩序建设的偏离，是一种负面的力量，在社会上肯定要造成各种不满和反抗，最终威胁到制度和秩序本身。

毛时代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由两拨人组成，一种是坏干部，一种是假积极。这两拨人寄生在体制内部，通过干部掌握的选拔机制分配稀缺的“向上爬”机会，来实现相互之间的结合。反右扩大化和文革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检验这个同盟是否存在及其存在范围的关键史实。与其他制度和社会相比，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样具有自利动机，不同的是客观条件变了。在其他社会体制内部，分配稀缺的“向上爬”机会一样是官员实现自利动机的手段，不同在于采用何种标准来实现党同伐异、照顾自己人。封建时代的门生故旧会以“学术水平高低”等手段来兑现，资本社会和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也同样会留给官员一定的自由选择空间。

在整个文革期间，当权派的大多数和保守派，都属于“反文革派”阵营。他

们对于文革的推进特别是提出并执行“整黑五类”，李文也在“共产党”和“阶级斗争”的框架下加以正当化了。我的观点不同。我倾向于把当权派和大多数和保守派视为毛时代推动政治异化的“自主力量”。这两群人是为了自利目的来推动政治异化的，而不是为了制度运作的需要。这两拨人构成完整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恶化了他们小圈子之外近乎所有人的政治状况，构成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压迫。韦伯曾经预测说，社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官僚专政”。<sup>1</sup>用这个预言对照毛时代的政治异化，恰好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异化的形态——“官僚专政”是如何实现的：通过坏干部+保守派的政治同盟来实施。而造反派的代表性和文革的正义性（如果有的话）就在于：在造反派的视野里，坏干部+保守派的同盟是完全负面的力量，与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要区别开来对待，需要加以批评和斗争。在这一点上，我倾向于把造反派对于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批判，拔高一点：不仅仅意味着李文所说的群众评定干部的名分，而且意味着对于公有制社会里官场主导下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第一步清算。文革所检验识别出的“当权派+保守派”的政治同盟，我倾向于认为是公有制社会的政治异化的主要形态和典型表现。

在上海观察文革的局限性可能在于：在1967年之后的后续文革政治运动中，由于保守派的瓦解而丧失了其代表性的表现。此后造反派还得到提拔并且很少挨整，全国恐怕就只有上海与河南，这应该算是例外情形。所以，文革十年期间“革命造反派”这个名分，能够成为有效的政治资本而不是债务，有助于改善自身处境的，在全国是例外情形。而武汉的保守派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和待遇，比上海更有代表性：文革初期的保守派（当时称为多数派）在工作组或者党委的指使之下，搜集同学或者同事的黑材料，预备把别人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在1967年夏天组成“百万雄师”这样的专职武斗队伍，杀死造反派100多人，杀伤数千人；在1968年清队和随后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抽调出去搞专职的“逼供信”，把绝大多数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打成“五一六”分子；在1976年之后的揭批查运动中，不仅脱产搞专案工作，而且还逐步得到提拔。保守派的文化表现及其

<sup>1</sup> “韦伯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导致‘官员专政’的可能性比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更大。或者像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一次演讲中所表述的那样：‘私人资本主义的逐步消灭在理论上无疑是可想象的，……但是，假定这种情况最终发生，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它摧毁了当代产业劳动的铁笼了吗？没有，相反，国有化或‘社会化’的企业管理将变成官僚的……，如果私人资本主义被消灭，就只有国家官僚的统治。”（韦伯《关于社会主义（演讲）》，1918年，转引自托姆·博托莫尔著《现代资本主义》，顾海良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在揭批查运动中的表现，没有任何政策、法律依据，也不符合任何道德标准。保守派所扮演的角色，也不能说有助于制度运作或者秩序建立，仅仅是顺应了当权派的需要，是一种在“这么做将会受到提拔”的激励之下的标准的机会主义行为。正是因为武汉的保守派在把造反派“整成反革命”的过程中“投入过多”，结果捍卫他们的工作成果就成为捍卫他们政治利益。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武汉“百万雄师”的一些核心成员唯恐湖北省、市委屈服于造反派压力搞落实政策、平反，三次去北京上访，要求中央关注武汉“可能否定批清运动成果”。当权派联手保守派，在文革十年期间对造反派进行多轮镇压，既不符合政策和法律，也不符合当时的“革命名分”，也不能认为是有助于制度和秩序建设。这种顽固的政治症状，只能说政治异化的顽强表现。文革就像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十六条认定走资派是坏人，经过文革运动的系列验证，老百姓看到他们确实不是好人，连带各种亲近走资派的力量和群体也多半不是好人。文革最终可以验证的一点就是：把当权派的机会主义行为与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进行捆绑是不能成立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机会主义行为永远不会断绝的原因在于：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或者标准足以把官员的自主选择机会压缩到零，这与各种管理事务难以标准化和规范化紧密相关。美国的管理学大师泰勒把工人的操作进行规范化，制定出操作规程和单位工作时间内的任务指标。但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够把繁杂的管理事务也标准化，发明出一种管理领域的“泰勒制”。没有百分之百的标准化，就没有通过制度压缩官员自由选择空间的可能。一切制度迷信或者民主迷信的错误在于：对于管理标准化要么是毫无认识，要么是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就是说，官场的自利动机必然诱导各种机会主义行为，而管理事务难以标准化，则是制度设计上难以遏制机会主义的关键原因。区别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会相应地给官员留下不同的机会主义空间。毛时代的文革，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消弭官场机会主义相关。这一次的手段主要不是靠制度设计，而是靠改变力量对比，让非管理者批评管理者，让整个的被管理者群体按照自身对干部的“集体记忆”来评定干部优劣。这与今天格外强调“顶层设计”不同，是一种“底层设计”。这种底层设计的特点是：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容许被管理者按照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印象去臧否干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也许可以追问一下：这种底层设计对于压缩官员机会主义行为空间的效果如何？相比各种顶层设计

例如纪检、监察、审计等等制度，效果孰高孰低？

#### 四、“经济倒逼政治”现象与恶性政治竞争的影响

还有一点恐怕也很重要：李文提到的“红工”组织的“经济主义风潮”，说主流造反派不同情他们的权利要求。从微观角度和自下往上看，李文的看法应该有依据。这个观察角度如果用宏观角度检验一下，则不无问题。据戚本禹回忆，江青接见合同工、外包工之后表示同情，并表态说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事后周总理曾经找江青谈话，据说周总理很不客气地说：江青同志，你说的这些问题都应该解决，但是国家财政没有钱，是不是把你的工资拿出来去解决？此后，江青就不再介入类似的问题，承认自己不懂经济上的问题，再也不随便表态发话了。

<sup>1</sup> 这并不是说周总理比江青的同情心少，而是因为整个中国当时的农业以及由农产品支持的消费轻工业的总产出水平过低，不足以支持全体劳动者过上国企工人那样的生活（包括工资收入和福利保障水平），只能是部分人最好（大型国企工人），部分人次好（小国企、集体工人），农民的整体水平最低。这是客观的生产水平决定的，不管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观念如何，都肯定如此。所以，中央提出反对经济主义风潮，实际上不过是明确终止各种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过高经济要求”而已。

文革早期，武汉曾经有一个“五八二”的工人组织（1958年参加工作8年后还是二级工的工人），一样是“经济主义风潮”的热烈鼓吹者。不需要多么认真的调查研究，从常识出发就很容易理解：1958年参加工作的单身汉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二级工的工资每月38.38元怎么都很紧巴。但是，政府没有能力回应他们的愿望。直到1972年国务院下文调整工资，直面“五八二”群体的经济困难，由于财政能力的局限，他们中间也只有40%左右的人，得到了晋升一级工资的机会。

还是从宏观角度观察，毛时代的经济资源分配，从干部和工人对照看有着不小的差别，而且城乡差别也存在。但是，就整个历史而言，毛时代社会上层所占有的经济资源份额应该是中国整个历史中的最低记录。当时享有高工资的官员和

<sup>1</sup> 对戚本禹的访问，2012年11月

知识精英不是没有，但是人数极少，综合的后果就是上层占据经济资源的份额较低。在这个方面，作为一个事实判断，我倒是赞成邓小平“毛泽东夸大阶级斗争”的说法。就历史经验而言，毛时代的社会上层对底层所加的经济剥夺是比较小的。同时，还要加上一句，与各种经济剥夺相匹配的政治压迫也处于较低水平；换句话说，当时阶级矛盾是处在较为缓和的阶段上。

毛时代的经济分层，正如李文列举的，有着地区差和所有制乃至行业差别。其中，较高的大型国企工人的收入和福利水平，例如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也算不上小康，但是与解放前的包身工相比，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升。四清运动期间曾经广泛地进行厂史、村史和家史教育，大搞“忆苦思甜”，1949年之前上海纺织业中间盛行的“拿摩温控制下的包身工制度”，被拿出来与国企工人的状况进行对比。突出这样的经济变化，目的当然是索取政治上的回报。建国后国企工人收入和地位相对于49年之前的提升幅度，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意味着对劳动力施加“反市场化保护措施”——把普通的非技术蓝领工人的工资提高到大大高于“劳动力市场价格”（从前的“包身工”和今天的“打工仔”待遇是典型的劳动力市场价格水平），这意味着政府干预市场造成劳动力价格偏高于市场竞争价格，这个偏高幅度就是“准租金”。

用准租金检验李文所分析的“体制身份”：大型国企工人得到的准租金最高，小国企工人和集体企业工人次之，农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准租金，其所得最接近于劳动力市场价格（所以改革后是通过加大“农民工”的使用范围和数量，去排挤和替代“正式工”来实现劳动力价格市场化过程）。在私有制时代，所有的准租金都成为利润和地租归统治阶级所有。这些集中于统治阶级手里的准租金，一部分用于投资一部分用于消费。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了更为宽广的投资获利的路径，相比于封建制度的优势在于：用于投资的份额远高于封建时代。毛时代的全社会分配状况是，一部分准租金归劳动者所有，大部分通过财政集中起来支付经济投资和社会管理费用。由于毛时代实行中产阶级最小化政策，其效果就是压缩相应的社会管理成本，在部分劳动者分享准租金的同时投资能力还有很大提升。同时，毛时代最小化中产阶级政策，还意味着：原本在私有制社会可以分享更高额准租金的群体（主要是官员和知识精英群体），他们的所得份额被大大压缩了。

用个人的经济所得去观察毛时代，整个社会是相对扁平化的，而政治领域向

上流动机会是很少的。李文选择的观察角度，等同于“如何在一个扁平化的社会里头寻找上升空间”，结论是很难很难，还因此带来很多极为消极的政治现象。由此，李文也得出了今天远较毛时代“进步”的结论。李文的结论公正与否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可以说一句的是：李文选择的观察角度本身，肯定会直接导致这个最后的结论。如果近三十年没有工业化的进步，而是从毛时代退回到封建时代，从李文选择的角度依然会得出“进步”结论：毕竟所有两极分化加大的社会都将增加向上爬的机会，同时私有制的恢复还将开辟政治之外的经济上升通道，传统农业社会还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开辟在社会声望领域上升的通道（例如成为族长、乡绅），后者可能会支持传统社会比资本社会更为“进步”的看法。这完全不是什么夸张，因为已经有人在大声呼喊乡绅和乡愁了。

准租金的存在，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更多的劳动者愿意获得这样就业的机会，这就需要一种“流量管制”措施设置“进入门槛”。也就是说，准租金越高，所需要的流量管制政策就越要严格到足以排斥大多数候补人群。二是带来政治上的后果——工人在政治上的保守化，普遍对干部缺乏起码的批评和监督意识，这是文革期间工厂保守派力量很大的原因所在。李文所说到的难以改变体制身份，其实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构成的：准租金很高的情况下内部人很难选择退出，外部人也相应地很难进入，而壁立在内外部人之间的流量管制措施也更为严格。这种隔离状况，就体现为李文所说的“一次选择定终身”的就业制度。但是，应该同时考虑到准租金的存在，以及与准租金相关的流量管制措施，对于外部人而言固然是一种排斥机制，但对于内部人而言则是一种保护机制。也就是说，准租金的提升，内部人感受到的保护程度，与外部人感受到的排斥或者歧视程度是一致的。李文观察到了内部人和外部人的态度区别，但得出的结论只反映外部人的感受，选择的观察角度有所偏颇：突出“毛时代为改变名分而努力”的各种个人感受并对此进行提炼概括，并用这个来分析文革及当时的社会矛盾。但是这个观察角度恰好未能兼容内部人（内部人中间不少人成为保守派）的感受，文革期间保守派之所以存在而且还很庞大，也是有其社会基础的。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便是国企内部的工人，在1950年代初期就参加工作的人（其中一些人往往在短短几年中间就获得数次提级机会），和1958年之后参加工作的人，也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到了1958年之后，工厂内部提级提薪的机

会就很少了，原因在于这一年开始的大跃进导致全国的工业规模急剧扩张，新招收工人超过 2000 万，工业扩张到了“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此后虽然经过三年调整退回了 2600 万城市人口，但是，整个城市和工业人口仍然过大，无限逼近农村能够供养的最大水平。此后，不仅工厂乃至整个社会的提级提薪机会都很少，而且，城市新增就业机会也不多（雪上加霜的是，1960 年代中晚期还叠加了解放后的“婴儿潮”渐次进入就业年龄）。说到底，还是周总理的那种考虑：必须用各种手段控制住工资总额的增长幅度，使其小于农村的最大供养水平。后来的知青下乡、文革十年的工资冻结，包括李文提到的体制身份转换困难，都与这个必须按照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水平控制最大工资总额的目标相关。政治人物或者制度设计不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许可，这是“经济倒逼政治”。

## 五、在政治和社会流动领域的供求法则是如何起作用的

供求法则对于政治和社会领域也是一样有效的，任何供不应求的事物都会卖出高价，这种“卖高价”的记忆会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历史记忆。很多上层人士在自己的回忆中，对 1950 年代的肯定程度远高于此后的 1960 年代。其中的区别往往被简单地归结为“政策转换”——例如说是“阶级斗争天天讲”带来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奠基于人生亲历的感受，主要来自社会流动阶梯的宽松与否的记忆。因为在 1950 年代，政权处于草创阶段，同时工商业处于快速扩张期，大量的上层职位短期内提供给一个小得多的候补群体（这恐怕与 1980 年代早中期的大学生对整个社会的感受差不多）。在 1950 年代，稍微有点文化的人都能够得到一个职位，哪怕很少的文化资本都能够卖出高价。这是“求大于供”的特定阶段的普遍现象：向上流动机会的开放性和才干总是得到重视的记忆，就这样吻合起来。

说实在的，1950 年代“健康向上”的记忆，主要与亲眼看到很多人的才华得到重视和提拔的事实是紧密相关的。今天回顾 1950 年代，甚至可以说当时“过小的才华也得到了过度的重用”——这是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但国家和企业管理（包括技术职位）的需求极大所决定的。

相反，那些 1950 年代得到过度重用的人力资本，到了 1960 年代之后，就成

为一种霸占并阻碍向上爬机会的因素了。其间的好坏转换，应该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这一次运动确立了向上爬的标准中“政治资本”的分量（而政治资本的考评又是以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小圈子规则”占主导的），同时大大降低“文化资本”的分量；更为重要的后果，是全面终结了此前向上爬“较高通过率”的供求关系。1957年反右之后过度拔高“政治资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此前得到过度提拔群体的“资本拥有量”相匹配的——“文化资本”极度不足同时却是各种政治积极分子出身。在这种对于“政治资本”的重视背后，部分反映了当时官场中间对于权力的竞争关系。得到提拔的积极分子拥有较多的政治资本，因为有文化而得到职位的人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反右之后，确立的官场潜规则是政治资本优于文化资本，解决了官场内部的竞争优势评定问题。同时，高扬的政治资本话语，还纳入了内部人对外部人的排斥意愿，成为一种进入的流量管制措施，这吻合了“供求关系”的根本性转变——由从前的供不应求到现在的供过于求。

今天的高校中，青年教师对于“新三界神话”群体（指1977、1978、1979年三届大学毕业生，往往只花5年左右的时间却能拥有别人20年奋斗才能得到的学术地位）的垄断地位和霸道有反感。这个“新三界神话群体”，普遍被看做没有多少学问却过早成名，今天业已成为“学霸”，掌管学术资源分配权。同时，这群人还是立规矩和执行规矩的群体。由于这样一群人在高校中全面掌权，尽管有的人专著的某些章节抄袭率高达百分之七八十，却被说成是“不规范”而不加处分。反右确立的政治标准，可以看做是1950年代“过度提拔群体”对自身利益的表述和坚守；而今天的“新三界神话群体”对于高校学术资源的分配和学术地位提升的权力，也是一种自我利益的表白方式。换言之，在转折和过渡时期总会有一个快速得益群体；随后，这一群体作为一种“强势的社会存在”，会创造性地构建出一种机会主义行为模式和利益表述方式。与反右确立了“政治资本”优先的潜规则一样，今天高校中的“新三界神话群体”，总是用一种“毛邓时代两重天”的鲜明态度发言。他们把自己与后毛时代的社会转型紧密捆绑在一起，自况为改革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口吻近似于土改时期的“老贫农诉苦”。

正如李文所言，毛时代取消了寻求经济上上升的通道，再也不能指望发家致富了。一切有志于向上爬的人士，怀有各种抱负和野心的年轻人，都不得不盯住

政治领域，结果，全社会的竞争都集中到政治领域。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毛时代教育普及很快，这极大地提高了一代青年人的受教育水平和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再加上当时打压中产阶级政策的影响，结果是，通过率很低的政治阶梯面前，挤满了不甘于平庸、等着向上爬的人群。这极大地恶化了政治领域的竞争状况。这种竞争态势，给官场的机会主义者创造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官员有空前的机会去挑选最符合自己心意的人。恶性政治竞争的蔓延，与机会稀缺的竞争态势关系密切，恶性政治竞争极度助长了干部的机会主义行为。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恶性竞争的蔓延都将形成“投入过多、收益过少、没有公正和规则”的整体状况，这对任何一种制度运作都将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会导致制度信誉的极度降低，并在根本上催生一种完全投机性的社会心理，最终会充分支持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的“理性选择”。毛时代打压中产阶级的各种政策，除了李文所揭示的增加向上爬的难度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了“竞争标的物”的可欲性——也就是降低了人们心理中向上爬的预期收益。同时，毛时代还部分增加了底层劳动者职位的吸引力（最明显地体现在国企工人的待遇上）的政策。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向上爬的吸引力，同时增加了底层职位的吸引力。不过，对于这两个攸关社会流动的政策，不同人群的感受是截然相反的。底层的工人群体是接受并感恩的，但是，对于那些寻寻觅觅找不到向上流动的精英而言，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压抑。这种压抑感受，在特定的历史转型时期被格外“放大”了，并成为评判制度的标准和回顾毛时代的首要意识。李文所表述的感受不是个别现象，例如北大教授郑也夫也一样痛切地回顾毛时代不让人考大学，令人走投无路。

最后，对于文革期间提拔造反派的问题，在上海和河南可能比较突出一些，“革命造反派”的名分在这两个地方有部分兑现。但在湖北就不是这样，大学生中的保守派头头钱运录和漆林都是在文革后期就提拔了的。反过来，造反派倒是反复挨整，武汉“钢二司”一号头杨道远虽然结合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但1971年就被隔离审查，一直关押到1983年，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才放出来。就全国而言，提拔造反派恐怕仅仅是“名义上”的——他们占据一些省市革委会的副主任、常委名额，但实际上并不起作用。提拔的主要标准还是按照与当权派的亲疏关系，文革期间全国大多数地方恐怕都是这个样子，像重庆的黄廉和武汉的朱鸿

霞这种闻名全国的造反派头头，连入党目标都很难实现。上海、河南可能是例外，原因恐怕也在于上海、河南掌权的干部群体与造反派的对立程度较低。这种提拔方式与公开的“革命造反派”标准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干部实际拥有巨大选择空间的检验。

武汉造反派头头中，很多人都记得文革时期流传的“走资派四大策略”——“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组织路线结成死党，路线斗争引导对方犯错误，革命造谣好得很。”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还编排了一个作者：说这是林杰（曾任《红旗》杂志编辑组组长）从走资派的各种政治手腕中间总结提炼出来的。武汉新派工人头头吴焱金四十年后总结当权派的文化行为时说：走资派的两大基本策略，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应该说，当权派的各种镇压策略能够实现，都在政策容许的范围之外，也有违当时得到肯定的“革命造反派”的名分。很多高官不得不再检讨自己所犯的路线错误，但就是拒不放弃镇压造反派的初衷。

需要追问的是：文革十年期间，多种镇压造反派的措施为什么能够落实，而且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镇压力量，多数情况下是假手保守派这样的社会力量去实现。这样的史实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当权派有多大的能力越过政策和法律的容许，自下而上地为自己创造出“机会主义行为”空间。法国研究组织社会学的巨擘克罗齐耶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法令不能改变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醒我们，抛弃那种“好的制度或者政策设计能够制止官场机会主义”的幻象，走出天真幼稚的幻象，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和现实政治所包含的“丰富内涵”。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一日初稿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三日修订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定稿

【北京文革】

## 北京文革两派斗争简史（三）

胡宗式

### 十二、“5·16”的出现

1967年6月，“5·16”兵团打出“首都5·16红卫兵团”的旗号，公开进行活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矛头集中指向周总理。在得到第一张“5·16”的传单之后，我立刻用电话向总理办公厅报告。我说：“我是新北大公社，我有重要的情况向总理报告。”守机员问：“你是找总理还是找总理的秘书？”我说：“找秘书就可以了。”电话转到总理的秘书处，我报告了这份传单的得来和大体内容，最后问这传单怎么办？秘书答：“你送来吧”。

得到这份传单后，我们也立刻向公社总部报告。总部召开全体社员会，向群众宣布这件事并发表了声明。我在大会上讲了：“我们发现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反革命组织……”。第一份传单的主要内容涉及农口，动态组便重新进入农口进行调查。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是不可能把这事调查清楚的。我们认为：（1）这个反革命集团出现在地派之中，主要是由过去曾经反过总理的那些单位。（2）农大东方红驻农政农办的战斗队“5·16兵团”可能就是（之一）。我们还到财经学院、商学院等处进行了调查。这期间《红旗》杂志的记者郭××（原北大学生）到北大了解我们对“5·16兵团”的看法和所了解的情况，郭是我接待的。后来调查工作不能再深入了，这工作就停止了。1967年武汉“7·20”事件发生后，“5·16”集团利用这一事件，掀起了抓军内一小撮和反总理的逆流。他们在散发的传单上，把总理打成“7·20”事件的后台。师大学大庆战斗队贴出“从大庆道路看余秋里的野心”的大字报，否定大庆红旗。后来这个战斗队又贴了周总理的大字报。

以下是卜伟华关于“五一六兵团”兴衰的叙述：

7月上半月，“五一六兵团”在财贸口、农口发动所谓“第一次战役”和“第

二次战役”，大量散发《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五一六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当前形势的几个思考题》等传单，在八机部贴出标语：“打倒二月黑风总后台”，影射攻击周恩来。8月3日、4日，“五一六兵团”在紫竹院公园开会，决定成立总部，由张建旗（钢院）、程镇华（商学院）、苏东海（师大）、郭树忠（农大）、刘秉杰（农大）五人任常委，下设负责农林、财贸、文教、工交、军事、中学、外事、全国联络等8个方面军，确定了各方面军的负责人。有个别外地学生（如长沙一中、湖南师院附中等）也参加了“五一六兵团”的活动。

8月上旬，“五一六兵团”频繁活动，在西单、王府井、东四、北海、动物园门口、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都出现了他们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题目有：《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在农口干些什么》、《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背叛五一六通知》、《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周恩来》等等。他们还向北京各大专院校，以及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还到城里挨门挨户塞传单。这是他们活动的高潮，也是他们在遭到毁灭性打击前的最后一次表现。（参见王年一：《关于“五一六”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期，页34。）

……

8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召开造反派座谈会，在会上提出：“被坏人操纵的‘五一六兵团’是反革命组织，它把矛头对准周总理，实质是对准中央。”（《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8月11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批斗了“五一六兵团”的主要成员。

9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报道说：“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其中特别

提到了“五一六兵团”：“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对姚的文章赞赏有加，连称“很好”、“极好”，并在关于“五一六兵团”的段落后面加写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候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

在一片喊打声中，“五一六兵团”彻底瓦解了。“五一六兵团”的主要成员均被捕入狱。

### 十三、中学及军事机关

#### （一）北京中学的造反派分裂

1967年北京中学分成“四三”、“四四”两大派，新北大公社支持“四四”派，中学红代会的负责人李冬民是“四四”派，他和聂元梓的关系很好。我们动态组当时的重点是关注“联动”问题，对“四三”、“四四”两大派，只知道分歧在于对军训的态度。

卜伟华先生在他的博客中对于“四三”“四四”两大派，做了详尽的说明，现摘选如下：

1966年10月以后，高校造反派已逐渐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主角，中学的老红卫兵和造反派之间的斗争虽然也很激烈，但多是局限于校内，对社会上影响不大。1967年2月24日，江青、谢富治接见中学造反派时说：中学很重要的

任务就是同“联动”作斗争。3月以后，中学都开始军训，在军训团的领导下，大力强调大联合，并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组织。1967年4月3日和4日，中央文革小组两次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谈军训问题。

4月3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江青在讲话中批评了军训解放军在北京中学解散造反派组织的做法，她说：卫戍区有很多做法不妥当，我们没有让他们支持联动，卫戍区的同志要虚心听取小将的意见，要把左派组织恢复起来，壮大起来，大联合哪能不以左派为核心呢？康生在讲话中对北京卫戍区负责军训工作的副司令员李钟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李钟奇3月27日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这个讲话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反动路线的斗争，完全是联动的观点。”“这个讲话是联动的代表作，现在联动又活动起来了，为什么他们老不解散？就是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他们。”[8]（卜原文注：中央首长接见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代表的讲话（1967年4月3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傅崇碧、李钟奇不同意康生的话，当场起身辩解，被江青、陈伯达制止。

中央文革小组及谢富治等的这次讲话使中学一度受挫的造反派大受鼓舞，并激起了他们对军训解放军存在的不满情绪。过去因为怕被别人扣上“反对解放军”的帽子，造反派大多不敢公开对军训团和卫戍区进行对抗，现在有了“中央首长”讲话的尚方宝剑，他们便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抗争了。批评军训团和卫戍区的大字报很快就上了街，有的还直接点名批判李钟奇。

4月4日，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学造反派，他们讲话的主旨是说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也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的做法。王力说：“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一定要采取适当方法，不要公开提。关于军训要总结经验，即使军队的同志支持错了也要给他们提供情况，让他们改，改了就行了。‘揪出李钟奇’这个口号不好，要改掉，要爱护卫戍区，卫戍区是保卫毛主席的，不能把他们搞臭。”他们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要搞班级大联合。这次讲话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红卫兵以鼓舞，他们坚持认为支持军训团没错，搞班级大联合没错。

从总的来说，“四三派”和“四四派”都是文革初期北京中学的造反派红

卫兵组织，它们都毫无保留地响应毛泽东号召，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号令，是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中学中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依靠力量。

在新成立的北京中学红代会中，“四四派”占有明显的优势，主要负责人和多数成员属于“四四派”。4月下旬，中学红代会作出决定，不承认六中“红旗”等“四三派”的11个组织，吸收与这些组织对立的“四四派”组织加入了中学红代会。已经加入了中学红代会的“四三派”组织，为了与“四四派”相抗衡，组织了“四三串连会”，在北京市各中学造反派中进行串连，发动一个又一个的宣传攻势，组织各种活动，与被“四四派”掌握了实权的中学红代会对着干。

中学“四三派”虽然人数少，但能量很大，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北京各大学造反派组织的支持。4月19日，由谢富治指示成立，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等8个高校造反派组织参加的中学运动调查组发表了《关于目前首都中学运动的声明》，提出：“目前‘联动’保守势力配合社会上的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把矛头指向造反派，妄图反攻倒算，挑拨革命造反派与解放军的关系，把反对解放军、反对军训的帽子扣到革命造反派头上，整革命造反派的材料”，提出前段中学大联合中存在右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表示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小将”。从措词用语上，明眼人不难看出他们的基本立场是支持“四三派”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在对待中学两大派的态度始终是比较明确的，他对“四三派”情有独钟，多次强调中学搞大联合要“以‘四三派’为主”。5月9日，清华“井冈山”与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800余人骑自行车进城游行，高呼“打倒联动！”“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彻底批判反动血统论！”以此表示对中学“四三派”的支持。

## （二）军事机关

1967年初，军事机关的造反派分裂成“一筹”、“二筹”两派，高校中多数组织支持“一筹”，北大和少数高校组织支持“二筹”。

北大动态报第111期1967.4.19第三版刊登《答读者问》：

近来我校同学佩戴一种纪念章，上有毛主席像、‘1.19二筹’字样，许多同学不解其意，问“1.19二筹”是怎么回事？下面简介：

当军事院校和文艺团体造刘志坚与黑三条反都到北京来的时候，江青同志点破了刘志坚的阴谋后，军队造反派成立了筹委会，在讨论大会宗旨时有分歧，二筹认为斗倒刘志坚，是符合江青同志的讲话精神的，一筹却认为刘志坚是死老虎，要揪刘后台，把矛头指向肖华同志，以极“左”面目出现。当时中央文革认为二筹大方向是正确的。一月十九日，二筹开了斗争刘志坚大会，而一筹等单位冲了这个大会，并造谣说江青同意他们冲的，并同时抄了二筹的家，把材料抢走。我校认为二筹大方向始终正确，他们的行动符合中央文革指示精神。后来一筹等组织组成的新一筹中的一小撮人冲中南海、解放军报社、国防部等，并来我校大闹。历史证明 1.19 大会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一筹要揪肖华同志却完全是错误的。我校参加了二筹。

在运动初期批判党委时，“一筹”、“二筹”两派，都是反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等的。保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等的一方后来兴起成立“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三军）”。1967年5月13日，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展览馆剧场演出“长征组歌”。“冲派”派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空军体工队“战鹰红色造反团”、八一体工队“革联”、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新燎原”、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等十多个军内造反派组织和支持“冲派”的北京一些大学的造反组织共 1000 多人，以“不能让老保上台演出”为借口，冲击了演出大会。两派发生武斗，双方共有 200 多人受伤，数十人受重伤。事件发生后，林彪派叶群到医院慰问“老三军”的受伤人员，事后林彪发表支持演出的讲话并观看演出。从此“一筹”“二筹”两派组合在一起成为“冲派”。在 5 月 13 日演出的现场，只有新北大公社文艺团的曹广志表态支持“三军”。此事影响重大，后来北大和“三军”关系很好。由于曹广志在现场是以新北大公社的名义表态的，“冲派”的许多单位指责北大。我们动态组当时和“二筹”联系，新北大公社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支持“冲派”。

大约 5 月 24 日，聂元梓、联络站的两人加上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去，见“冲派”的“星火燎原”的负责人，目的是和解，保持友好关系。因为校内对军队的两派有不同的意见，这样校文革就采取了同等对待的方针。在“纪

念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大会上，对两派都发了请贴。在发请贴之前和“三军”派打招呼，他们同意北大的做法。当“冲派”来到“五四”运动场时，看到“三军”也在会场，就愤怒地离开了会场，于是新北大公社和“冲派”的关系就断了。由于“三军”派得到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的支持，逐渐强大起来，而“冲派”却走了下坡路，很快消亡。当然，在“9.13事件”以后，形势又大变了，这是后话。

不能说“三军”是天派，“冲派”是地派。

#### 十四、陈伯达 6.5 讲话 天派、地派名称的出现

1967年5月份，全市性反潘、吴的高潮，使潘、吴的根基发生了动摇。他们的后台赶忙出来维护其一伙。我按时间顺序，把这些讲话列出。

1967年5月27日中午，聂元梓接到电话，要她在两点之前到达钓鱼台。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聂元梓谈话。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的。江青同志本来是要来的，她身体不好，还有别的事情，不能来了。你是有水平的，你是市革委会副主任，又是红代会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和我们共同来做。我们非常希望和你合作。你写的大字报和你在北大校文革的行动，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以后好好地合作。你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聂元梓说：“就是吴传启在搞两大派，到处伸手，制造分裂。清华、北航直到5月中旬才开串联会搞吴传启。”关锋插话：“真的那么晚吗？”陈伯达接着又说：“吴传启已经不在。你知道吗？两大派你要负责。”关锋说：“北京分出两大派，你要负责，你要揪出一个大后台，要叫大家吓一跳。”（聂元梓解释：这都是谣言）关锋说：“你态度不好。”在谈到谭震林问题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

5月底，关锋在一次接见以后把聂元梓留下说：“北京市的武斗你要负责任。”聂元梓说：“那么，我到农村去劳动。”关锋说：“你离开北京也跑不了你。”

1967年6月1日，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宣部工作人员讲话时，戚本

禹说：北京市现在搞两大派（王力插话：“互相搞一些不知是哪里来的东西，根据那些东西来确定方针政策。”）（关锋插话：“靠谣言确定自己的行动，就会迷失方向。”）。北京市现在两派斗争明显不是掌握大方向的斗争，不是搞大是大非。最近有两个动态值得注意，就是阶级敌人企图从两个方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转移大方向，一种是从极左方面，一种是从极右方面。极左方面不是把矛头对准刘、邓、陶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企图用各种流言蜚语打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煽动一些人攻击总理，攻击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从右的方面就是制造混乱，说中央文革分两派，支持一派，打击一派。过去说文化革命小组分两派还可以，因为有陶铸、王任重。现在的成员都是一起战斗过来的，团结是坚强的、坚固的。

1967年6月3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接见外事口时，陈伯达说：“最近街上有这样一些标语，是反对谢富治的标语：‘打倒谢富治！’‘谢富治算老几！’现在谢富治是北京市的首长，我投他一票，你们也有一份。这种标语是乱来，属于联动一类。写这种标语的人算老大吗？老子天下第一，自己来当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不是自封的，是大家推选的。”

6月5日，陈伯达在红代会核心组讲话，公开批聂元梓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节选）：

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人的话也不听了，中央命令也不听，我就造你们的反，谢富治副总理如果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造他的反。我批评谢富治同志，他太软弱了，对你们太宽容了。有人贴大标语：“谢富治算老几？”什么算老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拥护谢富治的，我投他的票，对你们采取无产阶级的强硬政策，你们这样闹不行，我就是要批评。我什么都没有，我是小小的老百姓、无产阶级。

有的同志说我：你最近批评的人太多了，我说，我还是要批评（谢富治：你敢字当头）……你们是拆革委会的台，要打倒谢富治（谢富治：只要把我打倒，市革委会能够巩固，北京市革命秩序能够恢复，那就是好的，我明天就倒）。首都都要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模范（谢富治：可是两派都要把红代会搞垮）。不要受坏人煽动，不要受自己坏思想的煽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谢富治：现在有些人私字挂帅，很严重）。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挂帅，

要造你们资产阶级思想的反（谢富治：有人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无产阶级，别人都不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考验一下，谢副总理，你找个时间把委员们都找来考（谢富治：这样不行，没有用，他们背得很熟，而且都会写）。那不一定，听说傅崇碧主持会议你们都不听，傅崇碧同志保护过我，我对他很尊重。有些人翻脸不认人，根据他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这些都是剥削阶级丑恶的东西。你们受压制时，我们的话是香的，现在不行了，你们现在站起来了，不仅要夺学校的权，也要夺市革委会的权，还要夺工厂、机关的权，现在最危险的是夺无产阶级的权。我们无产阶级也懂得，资产阶级也懂得你们，你们可能走到反面了，你们搞打砸抢，就是执行刘邓路线，……有人对我说，他们要故意闹，把事态扩大，要中央文革接见，我准备去，让他们随便踩死，献出一个人的代价，我年纪太大了，又没有用，说话还要翻译，让你们打死也好。

岁数小不要紧，毛主席希望你们做无产阶级接班人，能不能做，看你们自己，用打砸抢就能把谢富治打倒了？你们现在要准备条件做接班人，不是现在做接班人。你们脑子中资产阶级影响还是很深的，要革掉这些灵魂，中国就可以不变色，不然，还是要变色。有人可能反对我，他现在要接班，用打、砸、抢就变为资产阶级。这是受封建的帮会的影响，你们没有讲接班的条件，就想打倒谢富治，你们来当主任吗？主任不是自封的，是群众选的。谢富治如果交班就是犯罪，不能交班。你们现在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你们两派这一派对付那一派就是刘邓路线对待群众的办法，我们天天为你们着急，替你们忧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你们登了台，这样搞下去，可能搞修正主义，这样搞下去就得搞修正主义（谢富治：这句话很重要）。你们自以为是英雄，是无产阶级的英雄，还是资产阶级的小丑？（谢富治：不要走得太远了，你们两派，不论哪一派都不要走得太远了）。我得罪你们这些委员老爷了（谢富治：不是得罪，而是帮助）。不要用喇叭车，你们不要插入各省市、各机关的运动，你们不太了解，自惹麻烦。你们去帮助一派，反对一派，乱支持（谢富治：通通回你们学校去）。中学生你们也不要插手，中学生的分裂是由于你们大学生在里面插手，工厂的分裂也是由于你们大学生在里面插手，好像北洋军阀似地各占地盘（谢富治：这句话很重要）。我昨天批评了××不听毛主席的话，大批判大联合都不听，非得要去搞分裂，公开批判北京日报，听说有人要批判红旗和人民日报，我前天已经把话说出

来了。有人用联动的口号说：“活着干，死了算。”不知是为了哪个阶级干？不讲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资产阶级？以后你们再闹我就不接见了。我很严肃地指出，有人从右的方面，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党中央的领导。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不是儿戏，不是赌博。我没说过什么好话，这两句话是对的（谢富治：这两句话回去以后要好好讨论）。这完全是投机倒把的思想，这是资产阶级交易所的思想。

有的保守派就不一定是保守派，可能是造反派。比如三军演出，他们就是革命派。但有些学校反对他们，说他们是保守派。……一个学校没有别的派，就不能再搞成两派，特别是组织分裂，外单位到你们学校去制造派别，也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外贸学院东方红反映，说他们原是一个东方红，在外单位的支持下，分裂出新的东方红）。地质与新北大吵架，别再打了，北大是老大哥，别逞英雄，不要把地质打倒。地质也不要把北大打倒。北大地质各做自我批评。一个学校的事别的学校不要去包办代替。北大有缺点做自我批评，地质也是如此。新北大要做模范。有没有北大的同志在？（答：有）你们别组织两大派斗争，我前天在小礼堂讲话就是批评新北大的。但是你们其他人回去也不要攻击新北大。我们是希望人家好。北大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学校，又是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它成材不成材，是不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走别的路线，有这种可能性！这里要引起北大同学们的警惕。

前两个月我就批评了孙蓬一，地质去攻击新北大是错误的，孙蓬一就发火作了个报告，说我们上上下下万众一心，这没阶级分析，不科学，你们北大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小资产阶级？有一个会我是批评新北大孙蓬一的。“不是我们垮，就是他们垮，垮了再干。”这也是新北大一个人说的。孙蓬一有火药味，要有点老大哥的气派嘛，不然你们的名誉就损害了。吴传启算什么东西？吴传启你们说过就算了，提不上日程上。他这个人排不上我们社会的位置。……

吴传启我不认识他，谢富治同志也不认识他。有一种言论，说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都是吴传启操纵的，这是活见鬼！有人扭住周景芳，他在学部工作（谢富治：他是好人，是造反派的），我刚刚认识他，他是戚本禹同志派他去帮助谢富治工作的，是戚本禹推荐的，关锋同志开始还不愿意呢，要

把他调到红旗，当时我也同意了。这是一个老实人，别冤枉好人。吴传启不可能操纵我们的报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你们硬把他抬上来，这不是见鬼吗？这不是上坏人的当吗？因为他，就要搞武斗，这是被人在挑拨呀，这是帮助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来篡夺我们的权力。凡是搞垄断把持权的都是替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吴传启是渺小微不足道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抬高他呢？我们两个人一辟谣你们就垮台了。我们两个人都不认识他。你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口号会自己垮台的，不相信，将来会相信的。

北大拿这个借口少数人搞分裂，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想利用这个来搞内战，这一两个人就要垮台。他们认为打中了，就可以把北京市革委的权夺过来了，这是想入非非，胡思乱想，这种人一定要垮台。回去跟孙蓬一说一下，我不怕他进攻我，昨天我公开批评了聂元梓同志，我是不愿意点出名来的，对于聂元梓同志我们还是要保护的，你们不要乱攻，不要利用我的讲话去攻聂元梓同志，还是让她当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我支持她，不能够开除她。谢富治是代表党代表工人阶级来领导革命委员会的，不能知识分子来领导无产阶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究竟改造了多少？造革命委员会的反，是什么意思？值得考虑！我信任你们，所有才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这样严厉地批评你们，是因为我相信你们，你们也相信我们。我刚才发那么大的脾气，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是好意的来劝你们的，但一定不要利用我的讲话对某一个组织、某一个单位的批评，去攻击另一个组织，去攻击另一个人。不要去攻击新北大，不要去攻击聂元梓同志。北大同学回去告诉聂元梓同志，叫她不要生气，我这样正是为了她好。

陈伯达的6月5日讲话，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中央文革的既定方针。8月2日，姚文元在人大大会堂作关于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报告，会后关锋找到聂元梓，关锋还找来了陈伯达和谢富治，作了一次短暂的谈话，其中有一段：谢富治对聂元梓说：“好好把北大的工作抓一抓，对北京的事不要管，六月五日陈伯达的批评还是有效的，解决了北大的问题，整个北京的问题就好办了。全市全国的问题，你不要插手，工代会、农代会的事，不要管。”

陈伯达“6·5讲话”的作用，就是打击了轰轰烈烈的反潘、吴的斗争。凡是参加这一斗争的单位都受到了压制，尤其是北大。在北大，反聂的势力一下子

拉出 4000 多人的队伍，新北大公社内部的一些战斗队也纷纷“造反”，连广播台这样重要的部门都是如此。外校的一些人物更是欣喜若狂，不断来北大进行游行示威。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陈伯达也没能预料到。矛盾激化，问题突出了，想搞掉北大这个样板，肯定不是毛主席的部署。陈伯达见势不妙，赶快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我对北大的某些人的批评是爱护的，是好意，对吴传启是另外一回事”。“打倒孙蓬一，我不同意。打倒孙蓬一就是打倒聂元梓”。“学部的传达录音我听了，他们歪曲了我的话，语气也不对”。当时就我看到的材料，学部的传达和我们的传达基本是一致的。陈伯达的这一套不过是玩弄一个小权术而已。

戚本禹在矿院讲话，说北京有四大保守组织，即新北大公社、民院抗大、石油大庆和人大三红。这样，北航、清华、矿院要抛开这四大保守组织，把“北大派”其余单位拉到自己的一边，重组一派。由于有北航取“航空”之意，就叫“天派”，另一方有“地质”对应的叫“地派”。这就是天地派名称的由来。

## 【评论】

**作者简介：**朱晓茵，1947年6月出生于上海，北师大女附中66届高三三班。大学本科学历，理科学士学位。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编审。

1963—1966年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高中。1968—1971年赴内蒙插队，期间担任民办教师。1971—1977年，在湖北黄石工厂当工人，做过电工、描图员等。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华中师范大学黄石分院数学系（现湖北师范学院）。1982年毕业，分配到湖北黄石二中（省重点中学）任教。1990年调回北京，先后在《北京教育》、《北京成人教育》等杂志任编辑、记者、副主编。2000年创办《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杂志，任主编。2002年退休。

## 去伪存真

### ——王友琴关于刘秀莹老师的不实之词

朱晓茵

我是北师大女附中66届高中毕业生，是北京教育杂志的编辑、记者。因为工作关系，从1991年起，我就与刘秀莹老师往来频繁。刘老师患病后，我常去她家探望，并且帮助她整理回忆录，直到2013年11月刘老师溘然长逝。

2014年3月25日，共识网上刊登了王友琴的一篇文章，其中多次提到了刘秀莹老师。王友琴自称：“我也一直钦佩刘秀莹老师的诚实、正直和坚持道德原则。我也认为不能把无中生有的事情放在死者身上。”事实上，恰恰是她，在这篇文章里，把很多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词，强加到了刘秀莹老师身上。

死者长逝，不能为自己辩白。活着的人，有义务说出真实，还刘老师以清白。

—

王友琴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谈到报道中多次提到的刘秀莹老师。她1950年代初在师大女附中毕业，因家贫没有升大学，留校教书。她曾经担任薄熙来妹妹的班主任。尽管她在文革前就已经调出女附中，1966年‘红八月’中初三

学生薄小莹带着红卫兵抄了刘老师的家，把她家的东西‘能砸的都砸了’。”

这短短一段文字里几乎没有事实。

第一，刘秀莹老师从来没有担任过薄小莹班的班主任。薄小莹所在班为66届初三三班，她们班初一的班主任是张连慧（后调离女附中），初二、初三的班主任为赵世昌老师。

第二，刘老师家被抄过两次，来抄家的先是单位的人，后是街道的人。薄小莹从来没有带红卫兵抄过刘老师的家，“能砸的都砸了”的说法更是子虚乌有。

第三，刘秀莹老师从女附中高中毕业是在1949年，不是王友琴所说的1950年代初。毕业当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数学系，师从赵访熊、陈德璜、段学复、吴光磊、闵嗣鹤、钱三强等名师（摘自刘秀莹回忆录《上大学了》），于1952年毕业。因身体原因在家养病，正好母校急需教师，于是，她由张玉寿老师推荐，到女附中当了教师，直至1966年初调到西城区委工作。

## 二

在上述文章中，王友琴还说：“2004年《文革受难者》出版后，我向她（指刘秀莹——本文作者）报告这个消息，她则告诉我，薄熙来邀请她和别的老师到大连度假了，‘招待得非常好’。离开时送了他们每人一箱礼物，‘非常好的礼物’。她告诉了我‘礼物’的内容，以及对他们不要再提文革事情的要求。当时薄熙来正在权势上升时期。”

在1991—2004年间，刘老师出席的会议及活动，我都参加了。因刘老师的年事已高，又患有严重肾衰等多种疾病，我作为她的学生，除了协助工作外，也顺便照顾一下她的饮食起居（我清楚地记得，每次会议的早餐过后，我都要向食堂工作人员要一个小馒头或花卷作为她的午餐，因为她患有胆囊炎。基本不能吃会议的午餐）。回来之后，我帮助她整理材料，写《会议纪要》等。我可以肯定，在此期间，刘老师没有去过大连。我也问了一切可能陪同她前往的人，都说不曾有过她去大连之事。

为了印证这一点，5月21日，我特意走访了厉益森先生。厉益森是原师大二附中的党总支书记，曾任高级中学校长委员会秘书长多年，与刘秀莹老师有着较

密切的工作往来。我从他那里得到的一手材料，更加证实了我所了解的情况：

1. 刘秀莹老师没有参加2000年在大连召开的高级中学校长委员会第四届二次理事会。

1995—1999年，刘秀莹曾担任了中国教育学会高级中学校长委员会的第二届理事长（第一届她为秘书长）。在此期间，她为此学会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完全是“义工”。

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年会，每两年召开一次理事会，即一年有一次会议。每年一次的会议，我都与刘老师一同参加。我亲眼目睹了刘老师是如何对待工作的。她不顾身体状况不佳，从会议的筹备、主题的确定、主讲嘉宾的邀请、大会议程安排、大会发言人选、小组讨论的分组、会议的接待、会场的布置、会议的闭幕式总结以及会议纪要的撰写等等，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另外，在众多校长的提议下，校长委员会决定每两个月出版一期内部刊物《校长论坛》（至今仍在出版）。刘老师亲任主编，并担任选稿、编排，校对、审定。刊物的录入、排版、校对、印制、寄发等工作，刘老师都交给了我。为交流稿件、校样，我与刘老师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1999年，因为年事已高，加之身体患病，刘老师辞退了理事长的职务，由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王本中担任第三届的理事长。因此，2000年在大连召开的上述会议，刘老师没有出席（见照片一）。

2. 薄熙来与此次会议有关系，并送了礼物。但这些礼物都与刘秀莹老师无缘。王友琴所说的刘老师得到了“一箱礼物”、“很好的礼物”，纯属无稽之谈。

为开好2000年的这次会，当年5月，理事长王本中和副理事长、北京四中校长的邱济隆与北师大附中校长的厉益森等人，一起见了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薄是北京四中的校友。他表示支持在大连的这次会。

7月，在大连召开会议期间，一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的校长代表参观了几所大连的学校，并在大连市政府受到薄熙来的接见。在接见全体与会代表时，薄曾说过“母校的校长来了我是一定要好好招待的”这话，还玩笑地说，要显出我的尊师重教么！在市政府会议厅，薄熙来发表了很短的讲话，主要内容是介绍他在大连的政绩。接见后合了影。当时薄熙来以市长名义送给了每位代表一份礼物，其中有他亲笔题词“同在一个星球，共爱一方热土”的水晶球（见照片

二), 以及宣传大连的画册等。刘秀莹老师没有与会, 根本没有与薄熙来直接接触, 也没有得到会议的纪念品。



照片一: 2004年大连会议合影。前排中为薄熙来, 右为本届理事长王本中校长, 左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光华。

3. 薄熙来也不曾单独邀请刘秀莹老师去过大连, 刘老师没有收过薄熙来的任何礼物。(照片二: 水晶球, 底座上有薄熙来的题字和签名)



薄熙来在大连的任职时间是1988年—2000年, 其间他分别任大连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副市长、代市长、市委副书记、书记、市长等职, 2000年, 调任辽宁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0年, 刘老师没有参加大连的会议。王友琴说的2000年—2004年的几年, 刘秀莹老师已经带病在家, 基本没有参加任何活动了。时间上分析, 薄熙来也不可能邀请刘秀莹去大连。

在1991—2004年间, 刘老师出席的会议还包括其他的活动, 我都与她一起参加了。因刘老师的年事已高, 而且患有严重肾衰等多种疾病, 我作为她的学生,

除了协助工作外，也顺便照顾一下她的饮食起居（我清楚地记得，每次会议早餐过后，我都要向食堂工作人员要一个小馒头或花卷留着，以备中午饭时她吃，因为她有严重的胆囊炎，午餐的饭菜基本无法进食）。回来之后，我帮助她整理材料，写《会议纪要》等。所以我可以肯定，在此期间，刘老师没有去过大连。我也问了一切可能陪同她前往的人，都说不曾有过她去大连之事。

每次开会回来即使有什么小礼物、纪念品之类，老师从来都是送人。有的留给学校图书馆，有的送司机，有时给帮助过她的人。她从来不留，而是给她认为比她更需要的人。她退休之后，大家看重她的威望、人脉，她的经验和办学理念、管理水平，有许多学校甚至企业，高薪聘请她去做校长或顾问，她都拒绝了。但她可以无偿地帮助办学的有识之士，给他们提建议、想办法、牵线搭桥、介绍教师等，做一切她能做到的事。她有生之年资助的人不计其数，而且钱数都是以千计、万计、数万计。这在她本人的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是多么难能可贵！在她去世后，我与她的亲人一起整理她的遗物时，看到的除了书籍和墨迹外，就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写到此，我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这样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绝不可能接受薄熙来的厚礼，更绝不可能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

### 三

除了今年这篇文章之外，王友琴还在别的文章中提到薄熙来给了四中钱，这都是为了让她（刘老师）“不提文革的事情”。我不明白王友琴为什么要这样无中生有，非要说薄熙来与刘老师有联系。其实，刘老师本人就是文革受害者，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干校被隔离、劳改。她被解放回城时，竟然连话都不会说了……为此，她对王友琴等人的文革研究是完全支持的。

王友琴应该记得，你曾不止一次地登刘老师的门，从她那里了解你需要的材料，通过刘老师找到你需要联系和调查的人。刘老师在身体完全不能支应的情况下一一次次热情地接待你，甚至为你提供食、宿，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你所需要的资料，介绍她所能提供的所有线索，还逐字逐句地看了你的文章，帮你分析，指出其中需要改正的问题……这样的良师你还能遇到吗？记得她看了你的文稿后，曾

指出多处错误，并都用红笔画出。比如在你罗列的文革受难者中就有女附中的梅树民老师，实际上，梅老师直至2012年才去世……诸如此类明显错误就有多处。

刘秀莹老师之所以这样真诚地对待你，认真地看你的文章，并坦率指出里面的问题，是对你最大的帮助和爱护，也是出于对历史的负责！

我之所以我没有及时反驳王友琴，是因为我爱我的恩师，我不愿在她刚刚离开人世之后不得安宁。但思来想去，我觉得我必须说话了。因为共识网上的文章世界上的人们都能看到，不知情的人看到，会相信它是真的。这样，刘秀莹老师就背上了黑锅。而且按照王友琴在其它文章中的逻辑，如果时隔多日没有接到别人对她文章的回应，那就是对方不能肯定她所说的文章有什么错误。这就是说，别人对她的错误的无理睬就是“不能否定”。如此一来，我就不得无理睬了。我要让人们知道，事实是怎么样的。刘秀莹老师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她有着挚爱她的亲人、学生，有许多曾与她共事过的同事、朋友。我们还在，还可以说话。不会让王友琴一个人的谎话满天飞！

王友琴说：“我用了大量业余时间来写作文革历史，是为了保留真相，追求正义。”“我欢迎读者来信订正增补我已经发表的文章和书。也希望读者们提供资料，一起来参与写作历史。”既然如此，就请王友琴兑现承诺，纠正自己对刘秀莹老师的不实之词。这不仅仅是为了还刘秀莹老师以清白，更是为了还原历史的本真面目，使后人能对历史有更加正确的了解。

2014年5月25日

【学苑新语】

## 理想的陷阱

——读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阿秋

托克维尔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假如平等和民主的精神导致了社会主义，结果将是集权的绝对专制，平等将变为伪装起来的奴役。”为何企图凭借人力实现社会主义，必然会走向极权主义？尽管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针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英国国内舆论中渐据主导地位的观点——“对经济进行有意识的控制”的批判，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路径：将关注点由理想的最终目标转至实现理想的手段——“计划”。

我们常常将共产主义理想的目标与手段相剥离，在行进途中一心想往着理想的终点，却忽视脚下的道路，以致掉入极权主义的陷阱中。为什么近代中国的理想主义者抱着对未来自由民主平等的美好幻想，革命造反，建章立制，最终却走向了专制与奴役？这种理想的陷阱又能否绕开？

共产主义理想是一种玄而又玄的东西，它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没有贫富贵贱、安逸祥和的大同画面，这实质上反映的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它给予青年人奋斗的目标和信念，给予“以天下为己任”者道德感和责任感。但凡对现实社会的不公与黑暗抱有不滿、对贫弱者抱有同情悲悯之心者，都难以抵挡住来自共产主义理想的诱惑。理想赋予人激情，而激情易蒙蔽理性的双眼；理想赋予人行动力，而行动力易夸大人力、轻视自然规律。对理性的蒙蔽、人力的迷信在近代中国人通往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上埋下陷阱，而陷阱的底端是极权。陷阱被自由民主平等的鲜花虚掩住，常人难以辨识，需要借助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计划手段之本质的深刻认识和洞察力，对共产主义理想进行解剖与批判。

私意以为，近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非是由于资本主义繁荣发展，形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之孱弱，使自由主义精神文化未在社会立足扎根，在与社会主义思潮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共产主义理想也由一种社会思潮一跃成为大一统的政治强权。以计划为手段的共产主义理

想陷阱无人辨识，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极权主义。

实际上，二十世纪上半叶，共产主义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不论在西方社会，还是在刚走出帝制的中国，都经历了一场与自由主义的论辩。在自由民主传统深厚的西方，计划、社会主义字眼刚一兴起，便引起知识分子的警惕。有新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揭露计划破坏民主、法治精神的实质，更有社会主义者奥威尔著《动物庄园》、《1984》，提醒人们警惕共产主义的陷阱——极权主义。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关系的论争，将大部分统治者及民众从梦幻中拉回现实，看到在脚下这条叫做“计划”道路上埋伏着的极权主义陷阱。

而在资本主义基础薄弱的中国，人们仅从西方习得自由民主平等的皮相，对其内在精神却了解甚少，自由主义根基薄弱，不足以形成揭露共产主义理想虚假性的力量。中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民主平等的疾呼几乎与自由主义者无异，他们痛斥国民党的独断专权，承诺民主与平等。这些美好的字眼迷惑了一大批无自由主义常识却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痛心疾首于国民党政治上的独裁，经济上的腐败，急切地向往中共承诺的美好理想，对实现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的手段——“计划”则毫无防备之心，最终间接成为极权主义的帮凶。

1949年，大陆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着“去”还是“留”的抉择，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他们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的美好图景，企盼自由民主、国家富强的真正到来，忽视有意识地控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的内在矛盾。而胡适、傅斯年这类的自由主义者，从一开始便对隐藏在共产主义理想下的极权主义抱有警惕心理，清楚于“共产党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奈何全社会未有深厚的自由民主精神传统作为对抗力量，早已陷入理想的幻象之中，寥寥数声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对警惕理想陷阱的呐喊，即刻便被喧嚣的狂潮淹没。

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高度繁荣基础上的产物，是实现了真正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现实却往往是，缺乏资本主义基础的国家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走向极权主义的奴役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繁荣国家拥有自由民主的文化传统，对理想的陷阱更具敏感性；资本主义薄弱的落后国家对近代自由民主观念并无深刻认知，对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迫切之情让他们忽视了脚下极权主义的陷阱。

## 【纠错擂台】

编者按：本刊自第113期起，设立了“纠错擂台”的专栏，并刊出了网上流传的“谭厚兰被迫害惨死”的错误信息，请大家纠错指谬。一个月以来，我们收到了17封来信，根据来信的时间和答案的准确度，选出优胜者——人大研究生曹佐燕。下面是他的答案。

## “谭厚兰被迫害惨死”之说的八处错误

曹佐燕（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研究生）

中华论坛网站上刊载了顺风扬帆远航先生（下面简称顺先生）2013年12月15日关于谭厚兰被迫害惨死的说法，其中有八处错误。兹列如下：

● 原文：没有任何证据捣毁孔庙的谭厚兰，在监狱被残酷迫害致死，谭在监狱里，遭到了刘涛创立的保皇派红卫兵头目的集体轮奸和割喉。

◇ 说明：上述文字中，有三处错误：

❖ 错误一：关于谭厚兰捣毁孔庙，不是没有任何证据，而是有大量证据：有曲阜党史工作者的记载，有当事人的回忆，有现场录像，还有大量实物。谭厚兰其人及其率领北师大井冈山等造反组织捣毁孔庙的经过如下——

◇ 谭厚兰（1937—1982）湖南人，女，中共党员。1965年作为调干生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1966年8月在校内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任总负责人。与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并列为造反派的“五大学生领袖”。1966年11月9日，谭厚兰在上层人物的授意下，带领北师大“井冈山”的造反派200余人，联合曲阜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的29天里，造反派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700多册。他们

还刨平孔坟，挖开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对其进行曝尸批判。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解押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坟。造反派还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

❖ 错误二：关于谭厚兰在监狱中被残酷迫害致死之说，违背基本事实。谭厚兰确实死在狱中，但她死于癌症，而不是所谓的“残酷迫害”。下面是谭厚兰在1968年以后的经历和被捕入狱的情况——

◇ 1968年10月，谭厚兰被分配至北京军区4627部队劳动锻炼。1970年6月，调回北师大受审查。1975年8月，审查结束，被送到工厂劳动监督。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此时谭厚兰已患上癌症。1982年底，谭厚兰病死狱中。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其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免于起诉。

❖ 错误三：关于“谭在监狱里，遭到了刘涛创立的保皇派红卫兵头目的集体轮奸和割喉”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因为——

◇ 1. 时间不对。刘涛（刘少奇之女）与贺鹏飞（贺龙之子）创立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19日，同年9月28日，其领导人宣布自我罢官。12月18日通令解散，烧毁大印（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记》页383，香港五七学社，2009）。谭在监狱里的时间是1978年至1982年。顺先生的说法不过是“关公战秦琼”的翻版。

◇ 2. 逻辑不通。谭厚兰所坐的监狱由政府管理，而不是由清华大学的什么组织管理，因此，外人不可能到监狱中，对谭实施集体强奸，更遑论割喉。

● 原文：刘涛在文革刚爆发时，率领保皇派推倒了上千年的清华二道门古老建筑，打死清华卞副校和上千广大教学员工。

◇ 说明：上述文字有三处错误。

❖ 错误一：清华大学二校门是贺鹏飞率北京12所中学的红卫兵推倒的，刘涛

是领导者之一，说她率领云云，不准确。

- ❖ 错误二：说清华大学的二道门上千年，误。清华大学二校门是其前身清华学堂的校门。始建于1911年，距文革发动的1966年，仅55年。说它上千年，就是说它早在公元960年前就修建了，那时是北宋时期。

❖

- ❖ 错误三：“刘涛率领保皇派打死清华卞副校长”之说，是胡编乱造。

- ◇ 1. 清华大学没有一个姓卞的副校长。
- ◇ 2. 北师大女附中有一位卞姓副校长。
- ◇ 3. 北师大女附中的卞副校长不是被刘涛率领的保皇派打死的，而是被女师中和外校来的学生群殴致死。

- 原文：刘涛的红卫兵革命干将，烧毁孔庙，迫害和尚，烧毁文物。然而，刘涛所犯下的等等罪行，邓小平却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是可以教育过来的。

- ◇ 说明：上文有两处错误。如前所述，捣毁孔庙的是谭厚兰，与刘涛无关。因此，邓小平说她“可以教育过来”云云，是无本之木。刘涛确实曾经被当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是1968年。邓小平是否说过“这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是可以教育过来的”，待考。关于刘涛，简介如下——

- ◇ 刘涛1944年10月生于延安，女，原籍湖南宁乡。刘少奇与其第四个妻子王前的女儿。七岁入北京育英小学。195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1962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初，任校文革筹委会副主任，兼自动控制系文革主任。曾1967年1月，据其生母王前的口述和弟弟刘丁（刘允真）一起写了“揭露”父亲刘少奇的大字报。1968年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被分配到北京铁道分局承德车辆段当工人。1972年10月调到北京车辆段工作。1979年以后，曾以“清子”署名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并以《涅磐》为书名结集出版。现退休居北京。

**参考文献：**

1. “谭厚兰” 百度百科。
2. 中共曲阜市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曲阜市历史大事记》（1919.5—1996.12），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221—222页。
3. 温乐群、郝瑞庭主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40—43页。
4. 《谭厚兰的生与死》，载阳木编：《“文革”闯将封神榜》，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85—89页。
5. 冯敬兰、刘进、叶维丽、宋彬彬、于羚：《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
6. 钱江：《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炎黄春秋》2006年第6期。
7. 王晶焘：《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8. 孙维藩：《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第65—66、79页。
9.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
10. 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
11. 蒯大富：《清华文革“五十天”》，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

【述往】

## 我的母校师大女附中

刘秀莹

### 一、日本统治时代

我是1942—1949年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学习的，在女附中读了七年，其中因病休学一年。这七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2—1945年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大好河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日寇铁蹄下，校园内风雨如磐，师生们沦为亡国奴的日子里，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我们这些初中生懵懵懂懂，只能在苦中作乐。

40年代北京市只有三所市立女中：女一中、女二中、女三中，师大女附中是唯一一所国立女中。私立有贝满、慕贞女中，一般人家的子女是上不起私立学校的，能考取师大女附中也不容易。但当时是日本人和汉奸当政，学校已不是欧阳晓兰女士办学的模样了。我们的一个班里有许多后门生，她们十七八岁，不念书，考试作弊。班上有一个上一年级留下来的学生，一到考试就犯病，抽羊角疯，口吐白沫，全班乱作一团，互相抄袭，一个班大大小小融不在一起。我也不喜欢这个班，初一年级第二学期，我、陈鲁生、王素梅三人都得了伤寒病，只得休学一年。1943年，我又进入了一个新班——初二丙班。

女附中校舍不大，有三座小楼，临辟才胡同的一座小楼是砖石结构，灰色的，楼上是理化生实验室，楼下是仪器标本室，东头是校长室。中院有一座木制楼梯的二层楼，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都在这里上课。红色木楼梯下有绿色连廊直通后楼。后楼也是两层砖石小楼，高二、高三在楼上上课，下面是图书馆和女教师宿舍。中楼后面有一个小饭厅，小饭厅旁边是两间教室。我们高一曾在这教室上过课。礼堂和后楼之间还有一间四面玻璃窗的大而宽的教室。前院东西小平房为教务处、训育处、总务处，西面小平房上家事课，东面为小卖部。前院有一棵大梨树，全校有许多棵海棠树。每到春天，使人想到“梨花一枝春带雨”、“海棠枝头春意闹”的诗句。那雪白的梨花、粉红的海棠，真有些迷人。坐在连廊上，

树上落花如雪片，“拂了一身还满”，那是一种什么享受？后院邻墙有一棵大柿子树。一到秋天，满树的红柿子挂满枝头，使人垂涎欲滴。每年的9月5日刚开学，同学们的课桌上都摆着分到的一个柿子、一个核桃和一堆海棠，分享校庆的快乐。

当时师大的校长是黎锦熙，他兼任附中校长，附中只派一个主任叫戎春田，此人亲日，留着一小撮仁丹胡，个子不高，不怎么上班。学校由训育处和教务处主任管理，训育妈已换了人，徐慕贤被撤下，来了一个叫万年青的，学生管她叫“万婆儿”，戴一副黑边眼镜，不苟言笑。徐大妈改教音乐了。她是师大音乐系八美之一，钢琴弹得不错，只可惜唱不出来。教音乐的不会唱就不会让学生喜欢，你再有本事也不易立住。训育处有一堆“嫂子”，始终不知大嫂是谁。二嫂姓金，矮矮的胖胖的，不怎么管事。三嫂子姓张，人比较老实，她不搭理学生，学生也不搭理她。最麻烦的是四嫂子，也姓张，一天到晚找学生岔儿，学生也最喜欢戏弄四嫂子。后来又来了一位裘子坤裘嫂子。女附中的众小姑子不好对付，有一点风吹草动便群起而攻之。此外还有一个陈大姐是一个卫生员，她只会涂红药水。

训育处管学生靠通知簿，每天学生到校要交通知簿，学校给你盖个章子，表示你来上学了。如果有迟到、早退，鞋穿得不对了，一律在通知簿上盖章，第二天必须把鞋袜穿好，否则算你旷课。这是一套紧箍咒：头发不许烫，不许梳辫子，只需长过耳下一寸。徐慕贤做大妈时，手里总揣着一把剪刀，看谁头发长了上去就是一剪子，无比的讨厌。

教务主任叫赵履绥，由于秃顶头放光，学生给起个外号叫“亚司令”。这是一种电灯泡的牌子。亚司令是教平面几何的。1944年总务处来了一个大高个子姓李的，外号叫“李铁塔”。此人贪污，高年级学生示威游行，驱逐“李铁塔”；学生在前面贴标语，总务处在后面揭。最后学生把标语口号贴到女厕所里，总务处无计可施。李铁塔下了台，这也吓坏了总务处的郭胖子，从此，只要学生要什么他都点头。

在学校里作威作福的是日本教官。这小日本名叫“筱原贤太郎”，凶残而恶劣。每个月8日、9日，他说叫大东亚战争日，他和主任们手拿篮球站在中楼上往下扔，让学生们躲避，说这叫防空演习。篮球砸中的学生便算是被砸死，他们狰狞大笑，这是永远也忘不了的耻辱。学生们恨不能把他捶瘪了。于是我们把一腔怒火都发泄到日语课上。教日语课的叫鲁庄，是个女老师，个子很高大。有一

天，她头缠纱布来上课，学生马上说，鲁先生，你遇上路劫的了吧？怎么没有把你打死啊？于是全班同学拍着桌面齐唱：“功课完毕太阳西，收拾书包回家去，见了父母行个礼，父母对我笑嘻嘻。”接着便高声唱：“一个小和尚，泪汪汪，上山去烧香，想起爹和娘。他不该送我去当和尚，阿弥陀佛在中央，十八罗汉在两旁。保佑我这小和尚，跳出墙，娶个小红娘，生个小儿郎，叫声爹来叫声娘，一个小和尚。”等我们全班声嘶力竭地唱完，鲁先生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

初二时，贾善长先生讲了一段中国历史。他上课时，让两个同学守住教室的前后门，如有教务处或训育处的人来打个手势。这样有人放哨，老师就给我们讲“九一八”事变、万宝山事件，讲收复东三省，打回老家去。学生懂得了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什么环境，也增加了对帝国主义的痛恨。但学校对学生管束得很严，这时又要解散学生自治会。全校学生和主任在小礼堂辩论，主任叫李抒纯，此人好像是个学者，不善言辞，辩不过学生，被逼得想下讲台而找不到下台的台阶，真可谓下不来台也！于是又恢复了学生自治会，学校又高压学生去请主任回来上班。每班班长必去。我只得去了，他住在西四北前车胡同，把他请了回来。我们就这样懵懵懂懂、昏昏沉沉地在学校度过了初中。

也有我们上得很好的课。语文课，语文老师叫黄淑环。黄先生高挑个，皮肤白皙，加一幅金丝镜。温文尔雅，白白的手臂上戴一个绿镯子，讲课娓娓动听、拨人心弦。她酷爱诗词，一首一首地教我们。讲解、背诵《石壕吏》、《将进酒》、《新丰折臂翁》……一学年下来每个学生都能背几十首。有时一节课就是背诗词，一行同学背这一首，那行同学又接着背一首。黄先生则眯着眼睛晃着上半身，轻声地和着。这45分钟，师生陶醉在诗词之中，多么惬意的语文课！黄先生很谦虚，一日讲《送东阳马生序》，讲到一个“遗”字，先生读遗(Yi)，阮若瑛同学站起来说，在这里，遗字读Wei，当馈赠讲。黄先生回去查了字典，第二天上课，先生表扬了阮若瑛，并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学生对黄先生的这种谦虚态度肃然起敬。她住在后楼的一间小屋里，墙上挂着一幅对联，是师大中文系张海若教授写给弟子黄淑环的：“俯视元(无?)余子，抗心希古人”，可见黄先生是师大的高材生。两年教下来，黄先生为我们学好语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我们不会写错字，文字顺畅，能读会写，喜爱诗词，终生受益。

数学也是我们喜欢的课。教数学的老师关秉衡，外号叫“老x”。老x曾做过女附中的训育主任，30年代就在女附中教书了。她教我们时40多岁，人很慈祥。穿一件滚边的绛紫色旗袍，一双厚底鞋。短如男生的头发，戴一副白边眼镜，满脸都是笑容。她讲话很轻，从不高声，但清楚明白。每节课不仅使学生听得懂，而且学会，做题都能对。每星期至少有一次练习，少则五分钟、十分钟，多则一节课。有时一节课看谁做对的题目多谁就得100分。她不改作业，书上第多少页第几题得数是多少，她可以脱口而出，要不然怎么叫老x呢？一本中华书局的小代数她已教了几十遍，都能倒背如流了。老x养了一只大黄猫，大而笨。每天和关先生一起吃饭、喝水。有一天，一只老鼠钻进了柜橱，我们赶快抱了大黄来放进柜橱，让它去捉老鼠。大黄吓得嗷嗷直叫，结果让老鼠啃了一口，关先生给它涂了红药水。从此关先生也被学生称为“关猫”。我们上代数课从不捣乱，所以先生讲“负负得正”，学生很顺利地就学会了。有一次师大师生来校见习，关先生讲开平方、开立方，先讲原理，再教方法，出题练习，抽查学生，完全都作对，师大的师生对老x竖起了大拇指。

学生给老师起外号，是淘气，也是一种亲昵的表现，千万不要和学生计较。关猫、谢狗、沈耗子，便是我们上初中时给三位老师起的外号。“谢狗”是化学老师谢宽南的外号。谢先生教我们初二的化学，他是福建人，说话有点口音，头长的有点像狗头，学生便送了这一雅号。谢先生讲课耐心，讲拉瓦压锡排气法便边讲边操作，至今我们都印象深刻。谢先生有五个女儿：长青、芸青、秉青、柏青、立青，全是女附中的优秀生，人称五朵金花。

说关猫、谢狗必说沈耗子，这外号也不雅。初一时英语是马彤策先生教，马先生是位局长太太，发音很难听，没什么水平，学生没好好上过课。到初二换了沈珊先生，沈先生的丈夫是位名外科医生谢祖培。沈先生是上海人，英语发音很好听，人长得也俏丽，穿一双高跟鞋，背影翩翩，披一件外衣。一进教室，两只小眼睛滴溜一转，扫射完毕，把手指放在唇边说一声：“Should be quiet!”于是这一Should便被叫成“耗子屎”。她很厉害，上课时，我们模仿她的上海话，她就一句中国话也不讲了，满堂英文，学生听不懂，只好求饶，不再学舌。我们每天早上要早来半小时，全班默写单词、朗读课文，一年下来，我们班的英语有了长足的进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曙光。升到初三，赵静园先生教语文，第一篇作文题目是“醒狮”，中国这头狮子醒过来了。赵先生终生未婚，和老x一样独身。她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女师大许广平的同班同学。她个子很矮，喜欢穿高跟鞋，于是便得了“赵高跟儿”这一雅号。赵老师古汉语的功底很是了得，她讲刺字什么时候封口什么时候不封口，说：“记住，凡带刺的都不封口，如刺、如枣，马刺即皮鞭，打在马身上马一痛便快跑。刺要封口就不痛了。枣树上有刺，枣字也不封口。”十分形象易懂易记。她常讲黄庐隐的《象牙戒指》，也讲石评梅、高君宇的故事。婉转凄凉好不动听。每年暑假前欢送毕业同学大会，总是有一个特别的节目。47届的罗兆男同学把头发梳成赵先生的头发样子，穿上一双高跟鞋，戴一副黑框眼镜，款款上台，打开语文书念着：“一夕，人静矣！纽约某小屋中，乃有一老人倚窗外眺，举起沉默悲惨之眼，仰望蔚蓝之天空……”掌声如潮水般爆发了，罗兆男对赵先生的模仿秀，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初三的英语是陈秀老师教。陈秀也叫陈伯秧，外号“小白梨”，名副其实。她弱小娇嫩，白白的脸就像能滴水的白梨。身材窈窕，冬天穿呢大衣，腰围也不过50公分，穿着高跟鞋，上课戴手套。轻声细语，同学们回答完了她总要问：“Any body else?”直到无人补充为止。她发音很好听，业务很好，批改作业也认真，是我们上初中时最好的英语老师。可是她忽然病了，不能上课了，先是由陈秀先生的父亲陈器教授来代课。陈老先生只顾自己讲课，讲得眉飞色舞，学生听不懂，课上乱作一团，于是换成一位约翰张（Johnson）来代课，自称“晋臣张三”。他戴两副眼镜，看书时一副，看学生要戴另一副。这下好了，我们的教室后面放两个棋盘，一副军棋，一副象棋。学生们趁老师换眼镜的工夫，可以溜来溜去地去下棋。这样，这半年我们什么也没有学到，昏昏噩噩地过了初三。

初三数学是曹绮雯老师教的。曹老师不是学数学的，她主要做地下工作，教书是掩护。俞立老师是教史地的，也是地下工作者。我们那时很懵懂，不懂什么叫革命。体育课，初一是魏荣贞、初二是靳开兰、初三是毕悔芬三位女先生教的。我们班的排球、篮球都打得不错，周志明、孙延福等是运动能手。初一的生理卫生是董玉振老先生教的，音乐有杨慎箴、徐穆贤和李忙弟、王毓芳。王毓芳唱得最好，人长得也漂亮，外号“阿美”。美术课是杨老师和宋君方老师教的，一个

教山水，一个教花鸟。他们都有一定的功底，教我们这些调皮捣蛋鬼可惜了。时代的原因，他们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们不知深浅，一天到晚瞎闹。不过我们还是做了一件公益的事：从初二开始，放学以后，办妇女识字班，教女工识字，我们都是义工。

初三这一年，是国家光复的一年，我们抱着很大的希望，随之而来的是失望。蒋介石的重庆不承认北京的教育，说北京教育是伪的，要甄别。北师大自然也是伪的，女附中也不是真的。我们面临初中毕业，哪所学校招生，什么时候招生我们也不过问。学校无人接管、无人过问，我们得过且过，真有点“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味道。每门功课都稀松平常，我们班则筹划要在学校包一顿饺子，住一宿，全班要团聚一次。这可吓坏了四嫂子，天天到教室前转悠，以为我们要搞什么起义活动，其实就是包饺子。我们借妇女识字班的光，暗中准备。真正包饺子这一天一点也不露痕迹。四嫂子蹲到六点看看没有动静，讪讪地走了。我们干脆利落快，八点以前都吃上了饺子。饭后小操场上暮霭沉沉，夕阳西下，大家抱出被子，横七竖八躺在体操垫子上聊天、唱歌，玩了一个尽兴。后半夜，全部挪到教室内。第二天一早四嫂子到校时，我们已端坐在教室读英语了。我们把剩余的饺子都送给了打钟的老大爷，老大爷吃了好几天饺子，帮我们忽悠了四嫂子。

学校突然通知了我们，一些同学被保送进入师大女附中高中。我们初三丙班被保送的不过五分之一。

## 二、 日本投降以后

进入高中，高一年级只设了两个班，淘汰了一部分学生，又招进了一部分外校的高材生。我们长大了些，感到再像初中那样混怕是不行了。首先感到有竞争、有压力，再就是认识到该认真学习了。

高中阶段首先是换了校长，石石石磊任校长。石石石磊号称六个石，东北人，她是抗日六君子之一，30年代师大女附中的教员。此人有魄力，懂教育，她来校第一手是聘请优秀教师。教务处主任聘了耿克仁，训育处徐慕贤官复原职。

数学老师的阵容很强，高一平面几何有王卓亭先生教。王先生同时教山东中学、河北高中和外地一所中学，每周跑四所学校。他说他是石校长请来的，两班

平面几何，4节课，只上课，不改作业。他穿一身黑制服，一双破皮鞋，头发有些乱，浑身粉笔面儿。他的课十分精彩，他上课讲究方法和规律。告诉学生如何思考，遇到问题从哪里下手，什么样的问题加什么辅助线，画龙点睛，迎刃而解，多么难的题目在王先生手里三四步就能解决。他真是“授人以渔”，教会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不论多么难的题目，循着先生的教法总会找到答案。这是教我们诸多教师中我认为最好的一位，王卓亭先生后来去林学院当教授了。

高二的代数是鲁鸿珣老师，鲁先生是缠足又放足，外号“鲁小脚”，走路有些费劲。她终身未婚，人很和蔼，也是老北师大数学系的。她有点像暖水瓶，口小倒不出水来，讲课比较费力，还不容易明白。上鲁先生的课要加倍自学才行。高一三角是李振纯先生教的，李先生年轻有为、风华正茂，抡起胳膊来画一个大圆十分规整。她用单位圆方法讲三角，学生易懂、易记，上课谈笑风生。学生很喜欢这门课。高二的立体几何是张玉寿先生教。高三的代数与解析几何都是王明夏老师教。张、王二先生是中学数学界的泰斗。王先生1933年大学毕业，她的二哥是王人路，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王明夏先生的父亲是毛泽东的数学老师。毛泽东年轻时在王先生湖南老家住过一段，解放后把王先生的二嫂接到中南海会晤。张玉寿老师晚毕业三年，二人是莫逆之交，一直住在一起。二人都终身未婚。张玉寿先生一直在北京师范任教，北师的毕业生绝大多数是张先生的弟子。1948年，石校长聘张玉寿先生为女附中的专任教师。

张玉寿先生讲课清楚明白，对学生要求很严，课上还剩五分钟时，她一声“把你们的小本子拿出来”，大家乖乖地做题。当堂讲，当堂测验，看看学生听讲的效果，也检查了教学上有无漏洞。这办法很好，学生在课上必须全神贯注，十次小测验为100分，计入平时成绩，对学生了解也较全面；日子久了，学生们对这个“小本子”反而产生了好感。

王明夏先生的课最适合学习好的学生听。她高瞻远瞩，跨步大，讲一个小原理，不是一步一步地推导，常常跳过几步。学生要学会跟上趟。如果你还停留在一步计算或一个推导上，那先生已又讲出一大段了。先生的板书一节课从头到尾，不擦、不重，将将够用。如果有心人能复制每天的板书，一定是一本绝妙的讲义。先生讲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行列式……如行云流水，没有废话甚至多余的字。

无论是关秉衡、李振纯还是王卓亭、张玉寿、王明夏，这些老师们都有一些

共同的本领：一是能教懂学生、教会学生，并使学生喜欢数学；二是学会了就能做对，出错率低；三是不需复习。这么多年我没复习过数学，只要学会了就不忘。这就是优秀教师过人的本领。语文课是王泽青、马芳吾、徐瓚武三位先生教的。王泽青先生是北京三中的教师，石校长请来教两个班。他身上汗毛比较重，学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猴”。相对的还有一个“小毛猴”，是原来教初二的韩文佑老师。韩老师也叫韩刚羽，是研究鲁迅的，在保定师范很有名气。王泽青老师对女学生有些发憊，学生捣乱，他只置之一笑。他讲课比较扎实，这里要多写几笔的是马芳吾先生。马先生教我们时尚未婚，已经四十五六岁，与老母同生活，相依为命。马先生博学多闻，口若悬河。她讲《吊古战场文》一面跺脚，一面泪流满面，悲痛欲绝。全班同学为之唏嘘！可当马先生讲《滕王阁序》讲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我们仿佛都来到了鄱阳湖畔，真叫一个引人入胜。马先生给我们出了一道作文题：“君子忧道不忧贫”。她批改作文十分认真，评点作文的课大家都喜欢听。她常讲一些野史、轶事，生动活泼。如有一次讲纪晓岚，她说纪晓岚写了一幅字：“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明显丢了一个“间”字，应为“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纪晓岚说，我写的是一首词：“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纪晓岚的绝顶聪明，马芳吾先生顺水推舟，告诉我们标点符号的重要作用。先生对自己心爱的学生溢于言表，学生给先生的高足送一个雅号，叫“马氏大坎肩儿”。1947届的孙雅英、陈遇春，就得此头衔。孙雅英一生教中文，陈遇春是北师大二附中有名的语文教师。在师大女附中学习六年，受语文教师的教诲和熏陶，大家做到了不写错别字，写短文通顺流畅，信手拈来。

英语教师请来三位，教高一的吴谨铭，外号“吴大猫”；教高二的阎伯铭，叫“阎王爷”；教高三的赵德先，外号“赵大块儿”。我们高一、高二都是阎先生教。他穿一身灰色西装，有时穿哗叽长袍，戴一副度数很深的近视镜，骑一辆26吋小车。他发音很好，书法漂亮，八大词类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学的是Diagram分析句子用图解法，虽然科学，但很枯燥，把一些美的课文肢解了。先生改作业分good、very good、excellent、O.K.excellent四个等级。我们都瞄准最后一个等级，所以作业极为认真，挑不出任何毛病，还写得一手好英文。但是

我们的听说能力还不行。上了大学以后和南方的上海、苏州等地的同学比，我们差一大块；就是和北京的贝满、育英中学的毕业生比，我们也矮一截。阎先生有妻子、妹妹和三女一子，家庭负担较重，除了在女附中任教外，还在女三中兼课。他在解放初调到八中当校长，当西城区副区长，后来是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他是有领导和管理才能的多面手。

高二英语由赵德先老师教。赵先生也叫赵圃荪，因个子高大而得“赵大块”的绰号。赵先生是福建人，说话、读英语都有口音，发音不怎么好听，业务却很精湛。他讲的动词时态十分生动好听，分析课文细致入理。如讲《西线无战事》，一个战士听到枪声，他在战壕里一会说响吧！越响越好。一会说，上帝，别响了。老师让我们分析战士的心理，弄清战士的情感。希望枪响，是盼望赶快消灭敌人；怕枪响，是枪一响，死的是老百姓和乡亲。战士的心理是矛盾的，这样就把文学著作读懂了。赵先生让我们翻译金圣叹的《三十三不亦快哉》，45分钟一节课要写好一篇短文，在训练我班读和写上下了工夫。他介绍我们读世界名著《The tales of two cities》、《Uncle Tom's Little lamb》等等。他后来担任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又调到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当系主任。

高一的生物课开始时梁希唐先生教，后来换成孙淑世先生，孙淑世先生是北师大生物系的毕业生，很严厉，也是我们高一乙班的班主任，不过那时的班主任基本上不管班里的事。她讲摩尔根学说，45分钟出90分钟的题，目的是让学生谁也做不完，谁也得不了满分。我拼命地飞快地答卷，90分钟的题45分钟答完了，也只给90分。地理课高一时周宗尧老师教，北京三中来的，课讲得一般。高二是杨建章先生教，杨先生喜欢讲瑞典的斯文哈定，还喜欢讲美国大选，比较关心杜威能否当选。杨先生生了一场伤寒病，我和郝银妹去土壁厂他的家看望，同学们捐了一点钱，买了20个鸡蛋，我俩捧着到先生家。先生睡在土炕上，翻身都很困难了。家徒四壁，空空荡荡，寒酸得令人想哭。但在平时，杨先生总是精神抖擞。他喜欢打篮球，跑得很快。

高二年级开了一门看护学，是杨宝濂杨大夫开的。杨先生讲这门看护学很认真，我当时想学医，便认真学这本看护学。实际就是内科学，各系统的疾病成因、症状以及治疗方法都讲到了，这本书对我一生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高中化学二年级都是高善亭先生教的。高先生是山东人，穿一身灰或黑制服，

讲课严谨，实验动作规范，边讲边实验。我不喜欢化学这样的学科，要记忆的符号、公式太多，引不起学习的兴趣。高中物理则是耿克仁先生教力学，他的夫人徐玉莲教高三的电学。相比之下，徐先生讲得更为出色。耿先生是教务主任，板着脸孔，不苟言笑。学生说他是“耿尅人”。我们上初中时，赶上日本投降，到高三又赶上围城、解放。所以物理学学得残缺不全，几乎没有动手做过实验。解放后，耿先生和徐先生都去了河北北京师范学院。

体育课高中一直是吴宗武先生教。吴先生擅长舞蹈，她编导的水手舞、土风舞都很美。她虽已年近半百，跳起舞来，轻如落燕，很是优美。高中的音乐课是吴德棻先生教，学校开除了李忙弟老师，说他是共产党，请来了黎锦熙的儿媳吴德棻，这正好成为我们闹事的由头。上音乐课我们闹得无法上课，每节课吴先生都要含泪告别。我被石校长叫去训话，我是班长。石校长告诫我不要受人利用。我们没有受任何人利用，只是打抱不平。

还应该提一位教修身的老师，外号“老妖精”。真名叫程孝密，她是湖北人，她的丈夫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教育部长，是官太太，每天坐着包月洋车来上课，身上还盖毛毯。她讲修身，很少讲正经的课。两年来，我只记得一次她讲了“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敌寇，相率中原子弟还我中华”这副对联，劝我们爱国，其他时候她都聊了家常了。平时到后楼去，总看到一位年轻老师，戴眼镜，个子小小的，人很清瘦，披一件外衣，不是备课，便是看书，十分文雅。她不教我们班，是教历史、地理的老师，人称小高老师，名叫高文鸾。现在高文鸾老师也将近九十岁了。对于已逝去的老师，心香一瓣，愿他们永远安息；对还健在的老师，鲜花一束，祝他们健康长寿。

到了1948年，国民党的腐败，政治上的黑暗随处可见。学校里石校长要参加国大代表竞选，下午放学要静校，校园里到处拉了绳子，摆酒席请客。在学生心目中，校长应该是教育家、学者，不应参与政治。石校长热衷于国大代表的竞选，使自己的威信陡然下降。

高中阶段。我们努力了许多，国、英、算三门基础课给我们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高中的生活过得比较充实。大家总有学好本领、建设强盛祖国的愿望。可惜好景不长，到高三第二学期末，国民党已濒临崩溃，土崩瓦解，共产党围城，和傅作义商讨和谈，北京临近解放。

### 三、北京解放了

随着围城，学校被 29 军侯镜如的部队占用了，我们从后楼搬到前面的小楼，只上国、英、算三门课，每天只上半天课。满校园到处是国民党大兵，我们人在教室，心早已不知飞向何处了。

从高二下学期到高三这一年，我们都是在忙乱、折腾中度过的。高二第二学期，我们班负责欢送毕业同学，决定演出四幕大型话剧“魂归离恨天”，由吕宛如主演，周志明客串小伙子。周志明身穿白色西服，风度翩翩，引来许多女生的赞叹。张玉寿先生来看了几次排演。我们请八中话剧团的导演来给我们拍戏。做服装、布景、道具，全力以赴，演出引起轰动效应。可我和韩二丽几乎两个月没摸书本，高二期末我的成绩急剧下降。

高考前的八九天，一天晚上，我已入睡，周志明来了，她说咱们考大学吧！同等学力，考得上就上，试试如何。我想试试就试试。周志明的哥哥替我们报了名，这八九天我们照常上课、吃饭、睡觉。心想凭本事去考，考得上考不上都无所谓。我报的是北京大学医学系，上三年预科，准备考协和医学院，那时想当一名医生。

没想到我真考取了，于是我就去念北医医预系了。和 1948 届的郭玉銮同住一个寝室。数学是栾汝书先生教，化学是张龙翔教授教，生物是李济侗先生开的课。管化学实验室的是文重。我到北大上了两个月的课，学校让我交同等学力的证明。我回女附中去办，女附中处在瘫痪状态，学校不给开证明，磨来磨去无效，我是一个胆小的人，只好又回到女附中。这对我简直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从一个大学生又变回到高三毕业生。各科的笔记拉下一大堆，连夜赶抄也来不及，没有人帮助，倒有人看笑话。

随着解放军入城、接管，师大女附中被老区的育才中学合并，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转变，一切从头来。国民党逃到台湾，国民党的腐败使民生凋敝，百姓苦不堪言。谁不盼望共产党早日接管、北京早日解放呢？可另一方面，过去的思想都要翻个个，比如，昔日学历史，列强瓜分波兰，现在要承认苏联解放波兰。过去的观点都是错误的，错在哪里？不清楚。于是满脑子的问题不知问谁去。解放

区来的校长叫彭文，个子不高，大革命时期的老干部，齐耳短发，穿一身列宁服，讲话有腔有调。我们在这些老师眼里是改造对象，育才学校的学生和原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比，一个正册，一个是另册。这是真实的感受。

最难的是转变思想，思想可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原来上课认为有土地、人口、政权、军队，就形成国家了，解放了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显然，班上同学也分成两个阶级：进步学生、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落后学生、学习好的学生是资产阶级。学习越好的资产阶级思想越重。同学们不上课，课堂上出来进去，哪个老师也不敢管。操场上扭秧歌，锣鼓喧天，“南风细溜溜地吹，来了个秧歌队……扭呀，扭呀，扭出个新社会！”我很较真儿，我认为扭是扭不出个新社会的，如果不学习，拿什么去建设新社会？其实这只是一首歌，何必当真？我不去扭秧歌，于是我成了班上的落后分子。

学校成立了学生会，薛玉华是公选的主席，风云人物，能干，会讲话，有宣传鼓动力，勇敢、泼辣，是个人才。过去在班上不大学习或学习很差的学生，俨然成了新社会、女附中的主人；那些只知读书、不问政治的学生便成了落后分子。五月九日是师大女附中与育才合并的日子。“五九”从此作为女附中的校庆日。

我们这届的毕业典礼，我代表毕业生讲话，我的发言引来了育才学生的嘘声。我只是说树上的嫩叶变绿了，我们要毕业了，便被斥责为“小资”情调。我带着对新社会的疑虑，思想不停地斗争，要跟上时代，也不能丢了学习，还得读书。无论如何要考上一个好大学。那时北京的晚上没有电灯，在菜籽油、棉籽油灯捻下，我们认真读完一本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补上了所有课程的笔记。张玉寿先生帮助我补习了解析几何和大代数，到高三毕业考时，能得100分的科目我决心不让他得99分。不管怎么说，这一年拉下的功课总算老牛拉车似地赶上了，而且赶到了前面。顾德邻、陈鲁生、马德容、赵玉馨、赵熙和、刘伊玲、徐维和我八人都考取了清华大学。我考取了清华大学数学系。我们班考取北大的有10人。

回顾中学这一段生活，正如校歌中所说的，师大女附中，正正堂堂本校风，温和大方本校风，我们都认识到要堂堂正正做人、温和大方做人。我们没有忘记“勤、慎、诚、勇”这四个字的校训。回观我们这一生，勤奋是一贯的，无论在

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是勤奋的。我们也很谨慎，注意审慎地看问题，诚实则伴我们一生。我由于不会说假话，得罪了不少人，也惹了不少麻烦。至今保持不说假话的优点。论勇敢，我们是不怕困难的，什么困难也敢迎着上。这都是女附中培养的。这所学校培养了我们的自尊、自信、自强、自立。“谁说女子不如男”，在旧社会、新社会，师大女附中的学生都不弱于男校、男生。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女儿也不落后。不论是在什么岗位上，从事什么事业，女附中的学生都是响当当的。当小学老师，也是优秀教师，不断学习、不断进取。女附中的学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严格要求自己。女附中的毕业生身上都有一股劲，走到哪里便能一眼看出“这个人是女附中毕业生”，不信，上前一问，果然不假。多么好的学校啊！女附中，师大女附中，我心中永远怀念的地方！

2011-6-17

【述 往】

## 我的父亲母亲

——一个右派女儿的回忆

孙丹年

### 引 子



孙铭勋是贵州人，农民的儿子，生于1905年12月。小时候念过私塾，后从贵阳师范学校毕业。1928年因思想苦闷，走出贵州，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他在南京被困住了，既没有工作，又不能入学。

很偶然的，他看见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招生简章”，招考条件中有“必须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或土木工作经验的青年才能报考”的要求，这让他和一个同乡青年戴自俺感到很新鲜。

### 一、凝视生活教育放射的光芒

陶行知在辛亥革命中确立了三个观点：

1. 建立共和制以追求民主；
2. 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建立共和；
3. 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

陶行知的教育宗旨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育方法论为：教学做合一。陶行知的晓庄学校的办学目标为：把学校建设成为乡村的中心，教师要成为学校和乡村的灵魂，以教师的人格去影响学生和乡村人民。

孙铭勋报考晓庄学校的那一天，他和同乡青年戴自俺一起，出南京中央门，经过迈皋桥，在去燕子矶的大道上往西拐，进入通往晓庄的马路。他们被所见到的东西震撼了——只见路的两边竖立着一人高的大木牌，上面写着标语“我们的

信条”，一共 35 条：

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  
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  
我们深信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就是教育的出发点  
我们深信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使学生向上长

最后两条是：

三民主义教学做  
教三万万四千万农民做皇帝

这些木板做的标语牌，激荡着每一个来应考的青年的心灵。

陶行知计划的晓庄学校规模，包括：一所小学师范学校；一所幼稚师范学校；八所中心小学；四所中心幼稚园；三所民众学校；二所中心茶园；一所乡村医院。还有救火会、木工作坊、印刷厂、联村自卫团等等。冯玉祥送给晓庄学校一百多条枪，陶行知把他主持编的“平民识字课本”送了几千本给冯玉祥。



（左图：陶行知亲自设计的晓庄师范校旗。100个星代表征集100万位同志，倡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由于陶行知的巨大影响力，由于晓庄学校的成功，1929年秋天，晓庄学校向

江苏省民政厅递交了一份报告，申请一个教育自治实验学校，范围包括南京北郊的几个村镇，包括晓庄、燕子矶、（吉祥庵等村镇（整个北固乡），划归晓庄学校自行管理。除了不能收税，一切行政管理权都下放给晓庄师生去掌握，让他们进行实验；如果实验成功，再推广到江苏全省。当时江苏民政厅长姓缪，这位缪厅长居然批准了这份报告，同意划出一个教育自治试验区。

这个事例说明：教育救国的理想，是曾经出现过曙光的。

孙铭勋理解、认可了这一切。他“凝视着生活教育放射的光芒”，投身于生活教育运动。他选择了幼稚教育作为自己的专业。

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所实验性幼稚园，是陈鹤琴创办的南京鼓楼幼稚园。而第一所乡村幼稚园，是陶行知创办的燕子矶幼稚园。陶行知的理念为：中国的、平民的、省钱的。

陶行知提出了主张，而主张的落实则由他的弟子们去实践。孙铭勋和他的同学们，没有经费，没有设施，有的只是满怀的理想和热情。

燕子矶幼稚园是陶行知自己想办法修建的，孙铭勋觉得这座小房子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建筑：“如皇宫，如宝塔，既切实用，又极美观。”

他们给儿童吃的食物，玩的玩具，都是从附近收集来的。当地土产的豆类，玉米，莲藕，瓜果，就是幼儿园的点心；长江边的鹅卵石，细沙，树叶，花草，蜜蜂蝴蝶，小鱼小虾，就是玩具。他们还进行课程设计，推出“以儿童为中心的改造课程的尝试”，其中由孙铭勋主持进行的一个课程的单元设计，是“为孙中山先生祝寿”。

课程进行分为6次：介绍孙中山生平；布置寿堂；准备礼物；到镇上去买面；祝寿献礼物；总结回顾。他训练了一个小朋友来当大会主席，是个女孩。这个女孩态度庄重，嗓音洪亮，口齿清楚，不慌不忙地说：“今天是中山先生的生日，我们开会，吉祥庵的小朋友也来和我们开会。我们很快活，我们大家都快活，我们以后天天快活。”

这些活动的意义，在于训练民众养成集会的能力。孙中山提出要训练人民学会使用四大权力——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孙铭勋在陶行知的指导下，自觉地训练农村孩子从小具有关心政治、发表见解、行使权力的能力，为培育公民社会作准备。

1929年秋冬，晓庄师范的乡村幼稚教育活动进入鼎盛期。孙铭勋和戴自俺一起提议设立“乡村幼稚教育研究会”获得通过，他们的活动很多，理论探讨很活跃。

1933年到1936年，他们的理论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孙铭勋这一时期的著作一共有《办理乡村师范的意见》、《幼稚教育》、《幼稚教育论文集》及《幼稚教育论文续集》等8本。1934年国民政府公布4月4日为儿童节，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庆祝，孙铭勋和戴自俺写了《儿童节教学做》一书，告诉人们庆祝儿童节的方法，并举了例子。

1934年，陶行知派孙铭勋到江苏淮安去办新安幼儿园。在这里，孙铭勋得到了一个很稀奇的称呼：“孙妈妈”。当时在淮安的一个同学、同事名叫汪达之的，绰号叫“汪爸爸”。孙妈妈这个称呼跟随了孙铭勋一辈子，直到现在，重庆育才的老校友向别人介绍我的时候，还说“这是孙妈妈的女儿”。

孙铭勋跟随陶行知，先后参加创建或单独创建了晓庄幼稚园、迈皋桥幼稚园、新安小学及新安幼稚园、上海劳工幼儿团、广西平南幼稚师范班，等等。1930年代中期，孙铭勋已经是国内知名的幼稚教育家。

以上是孙铭勋与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关系。

## 二、浪迹天涯半生路

本来孙铭勋对政治并没有很大的热情，他不怎么关心政治。但是1930年晓庄师范被蒋介石查封，14名师生被杀害，陶行知遭到通缉流亡日本，孙铭勋也入狱4个月，这就使他对政治有看法了。

1935年孙铭勋在广西南宁办幼稚师范班时，当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来找他，发展他为党员，很快就宣誓入党。他的几个同学也都入了党。1936年孙铭勋和他当时的妻子邹慧珍（也是党员）跟另一个党员郑伯克同住，郑伯克突然被捕，他俩赶紧出逃到了西安，失掉党组织联系。

为了找工作，孙铭勋到了延安。当时延安还由张学良的东北军控制，他进了肤施师范学校当教师，同时开展革命活动。不几天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退出延安，红军开进延安城，孙铭勋非常高兴，赶紧去找熟人，找到了当时的红军土地部长王观澜，很快重新入党，组织关系由博古即秦邦宪掌握。他被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徐特立聘为延安边区政府的教育委员。

1937年夏天，陶行知叫他回上海。这次与以往的性质不同了，经过请示博古和王观澜同意，他由党组织派回上海，在陶行知处工作。

到了上海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他们随着国民政府西迁，经过武汉到了重庆，在重庆于1939年创办了育才学校，孙铭勋担任社会组主任。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统区的党员纷纷撤离，孙铭勋由组织安排撤到兰州，然后到了嘉峪关，创办了“玉门油矿职工子弟校嘉峪关分校”，据说这个学校一直延续到现在。1944

年日本鬼子占领贵州独山，贵阳危急，重庆震动。中共党组织准备派回大批党员到贵州的敌后去开辟根据地，由当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决定，所有贵州籍党员都回贵州去。于是孙铭勋回到老家平坝县，当了平坝中学校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孙铭勋回到重庆，1946年育才学校的主体迁往上海，谁知道陶行知先生突然在7月25日去世了。

育才主体迁上海后，重庆还留下77名孤儿，组织决定让孙铭勋来负责重庆育才分部的工作。1947年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公开的中共组织全部撤离。不久重庆发生了《挺进报》事件，对川东地下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事件，作为组织的中共不存在了，只剩下个别党员在坚持，孙铭勋也就是这个别党员中的一个。他不但将重庆育才分部撑持下来，解决了77个孩子的吃、穿、住、安全问题，而且还发展了育才学校，新招收一百多个学生，将育才恢复到以前的规模。他坚持到了新政权建立，即今天的重庆育才中学。

### 三、愿孩子们笑出真善美的世界

新政权建立了，孙铭勋欣喜若狂，他也是这个政权的一分子。他认为，政治理想实现了，武装斗争结束了，应该建设一个和平的、充满爱的环境了。他要努力去实现陶行知先生未竟的生活教育理想了。

孙铭勋思考着育才学校的发展。从办学方针、学校规模、培养目标、编制、教学阶段、课程设置等方面，他要育才学校发展为一所拥有幼儿园、全日制小学和专科部的“育才学园”。他要小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如音乐、美术、自然科学等特长生；另一部分，他要专门招收“问题儿童”，即调皮捣蛋的、特别顽劣的、甚至有犯罪倾向的孩子。孙铭勋一直认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顽皮的孩子往往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力，应该加以研究。孙铭勋计划建设一所国内第一流的生活教育实验学校。

1949年12月30日，孙铭勋写完了《从行知诗歌看教育》这本书，他用一首小诗作结：

主人开始作主，公仆从今为公。

报与钟儿知道，长敲自由之钟。

和陶夫子遗作，慰陶夫子在天之灵。

因为历史上陶行知与中共的关系，陶行知手下的大弟子们，即主要干部，几乎都是中共党员，这时都被安排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孙铭勋也被召去谈话，给他安排的职务是重庆市教育局副局长。贵州也有要孙铭勋回去担任职务的计划。但是孙铭勋不服从分配，他只愿意担任重庆育才学校的校长。上级同意了，委任他为第一任重庆育才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孙铭勋对陶行知和共产党在理论上的区别看得很清楚。他认为，陶行知的教育属于改良主义体系，而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属于共产主义体系，两者有着本质上、原则上的不同。但是两者并不具有对抗的关系，而是有着血缘关系，可以互相输血。

#### 四、西南地区“武训精神”的代表人物

这时，中共中央要为教育体制的大转向、全盘苏化扫清障碍了。如何对待陶行知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于是拿武训开刀，因为陶行知推崇武训。

陶行知去世已经5年了，中共拿他的弟子们作为批判对象。“坚强的党性使陶行知的弟子们别无选择”（笑蜀语）。

当时报纸上说：“深受武训精神影响的重庆育才中学，开始进行对于这一问题的学习时，孙铭勋即加以阻止。上级派员前去检查，孙铭勋亦事先布置抗拒，致使对《武训传》的讨论在该校无法开展。”

为了压服孙铭勋，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召集市教育局、团市委、团区委人员，组成工作组，组长邓垦（邓小平的弟弟），进驻育才学校。他们宣布孙铭勋“态度恶劣，拒不认错，无组织无纪律，功臣自居，思想麻痹，立场模糊”，报请中共重庆市委批准，给予“党内当众警告处分”。之后这个工作组撤离了。

第二个工作组又来了，由邵子南任组长。邵子南作风非常专横，把育才学校当作阶级斗争的战场，高调宣布“对阶级敌人要毫不留情”。动辄指斥老师“你不听党的话！”“你是极端个人主义！”等同于“你反党！”当时正在开展全社会的

“清匪反霸”，也称为“镇反”运动，报纸上隔三岔五的公布枪毙人，一次三个五个，有一次29个，最多时达到60多个。我在查阅这一段时期的报纸时，看得心惊肉跳。邵子南这么随便批评老师，谁不害怕。

工作组将孙铭勋隔离起来之后，首先发动学生们进行揭发检举。十来岁的孩子们，平时谁没点牢骚和意见，经过工作组引诱、鼓动、启发，把平时积压的牢骚意见发泄出来。过了几天，他们看见自己随口说出的话变成了铅字，登在报纸上，成了孙妈妈的罪状，目瞪口呆。其中有的人过了几十年，找到我的母亲道歉，说对不起，当时年纪小，被利用了。

然后发动同志、同事、朋友写文章批判孙铭勋。本来都是很熟悉的朋友，很支持赞赏孙铭勋的，全都反目成仇。从1951年10月到1952年4月，据我所查阅到的报刊杂志，点名批判孙铭勋的文章一共有30多篇，其中直接用姓名作标题的有20多篇。

(右图：中共重庆市委开除孙铭勋出党的决定)



孙铭勋倾注了极大心血的育才学校被分解了——部分撤销，部分合并于别的学校，剩下初中部改名为“重庆市第十三初级中学”，

再改名为“重庆市第二十中学”。孙铭勋的全部心血和理想，他用生命去维护的陶行知先生的遗愿，顷刻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他觉得活下去没有意义了。

导致孙铭勋自杀的直接导火索，是来自学生的侮辱。原来的熟悉的学生离去了，新招收的学生对孙铭勋不了解，对育才的历史不了解。工作组将孙铭勋单独关押，不给盥洗条件，一审问就是一昼夜，不让睡觉。睡觉时让他睡在100瓦电灯的强光下，使他非常烦躁。故意在学生吃饭时将孙铭勋带到学生食堂中间，让学生们围着他尽情侮辱，高呼“打倒资产阶级孙铭勋！”“打倒贪污分子孙铭勋！”

客观上说，孙铭勋是必须低头的，他不但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在西南地区的代表人物，他还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是党内党外的代表人物。他的态度影响着整个西南地区。但是，主观上说，孙铭勋却不可能低头，他不能说陶先生是错误的，也不能说自己几十年跟随陶先生是错误的。他对自己说：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1952年3月6日，孙铭勋用剪刀剪破了自己脖子上的动脉血管。惊动了卫兵，将他送到医院抢救。当时共产党员是不允许自杀的，自杀就是叛党。

孙铭勋被开除党籍、开除一切公职以后，他没有了生活来源。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他到处兼职当教师糊口。

## 五、终身维护陶行知教育思想

1953年，孙铭勋被调动到刚建立不久的西南师院教授儿童文学。



当时国内除华东师大外，还没有开设儿童文学课的。这门课程属于开创性学科，一切都是白手起家，这对孙铭勋来说是好事，他重新振作起来，全力以赴。从1953年到1957年，他先后编撰了《儿童文学讲义》、《儿童文学论文选读》、创作了《幼儿园朗诵诗歌》有好几集。还收集整理了《四川儿歌》（在四川儿歌界影响很大，改革开放后不少人找这本书）。他指导中文系、教育系两个系的学生创作《儿童谜语诗》，由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每个学生得到一册作品集外，还得到几

（孙铭勋与家人合影）元钱稿费，在当时这几元钱就是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费，都高兴极了。总之，孙铭勋把《儿童文学》课开得有声有色，大受欢迎。从1953年到1957年，他生活上比较安定，身体也稍好一些。

1957年春，中共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本来孙铭勋并不打算说话的。但是经不住反复动员，他作了两次发言。

第一次是1957年5月11日，在校党委委员全体出席的全校教授、副教授、讲师大会上，他第四个发言，为陶行知洗雪，说陶行知曾经具有非常大

的影响，功不可没，应该表扬陶行知。第二次是6月6日，经学生再三热情邀请，他到西师大礼堂作了一次报告，内容是考试制度应该改革，全场情绪至为高涨。

孙铭勋被划为右派分子。无休无止的思想检查，无休无止的强迫劳动，接踵而至的三年大饥荒，孙铭勋的身体衰弱到了极点。还要强迫劳动。他在西师中文

系挑煤渣铺路，扫厕所等等，他已经不能承受哪怕是最轻松的惩罚性劳动了，拖着脚，两只手扶着担子，走几步歇一下。

1961年的元旦之后，孙铭勋病了，几天没有去上班。中文系派人来查问，为何几天没有上班？明天一定得去上班。孙铭勋从床上撑起来，坐着和来人讲了几句话，这就是他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

1961年1月20日凌晨，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想奋斗了一生的孙铭勋去世，满55周岁生日才过了21天。

## 六、母亲邝忠龄坚持要平反，更要承认孙铭勋的学术成果

母亲邝忠龄是父亲的学生，他们是在学习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的。母亲是一个天才的小学教师，父亲对她说：“你最合适的岗位就是教小学”，母亲就教了一辈子小学。

父亲被划右派以后，组织上找母亲谈话，母亲当时在西师附小教书，组织上要求她划清界限，与孙铭勋离婚。那人叽叽呱呱说了一堆，母亲只回答了一句话：“铭勋身体不好，正需要照顾，怎么能离婚呢！”把那人气走了。

1958年，西师附小接到上级通知，说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附小还要补划一名右派。于是我母亲成了右派分子，她随着西师劳改队，在西南师院周围的几个公社劳动。

父亲去世，西师来收回住房。当时的住房都是分配给单位职工的，父亲去世，住房要退回给西师。按照规定，应该是母亲去找她的单位要求分配住房。但是母亲在农村劳改，她的工资关系已经从西师附小划出来，落到一个农村小学里去了，那里不可能解决住房。经人介绍，母亲被迫嫁给了她劳改所在的农村的一个贫下中农。

继父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心地很善良，但是脾气非常暴躁。由于跟母亲结婚，继父被贫下中农协会除名，使他非常痛苦。1975年春天，继父死于胃癌。

文革结束，我和妹妹同时考上大学，妹妹到川大，我到西师。母亲在农村教书非常出色，由西师附小召她回去。在母亲落实政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荒

唐的情况：她办理工作调动手续时，发现她的档案袋里没有被划为右派的记录。

办理工作调动手续，是因为错划右派，现在改正，为你落实政策。如果你不是右派，就不存在落实政策的问题，你就还是呆在原来的农村吧。

西师附小的校长杨洁梅想了个办法，她赶紧找了当年参加过划邝忠龄为右派大会的一些老教师，请他们来开个会，大家签名证明邝忠龄确实是右派。等于再给母亲划一次右派。

母亲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她马上争取为父亲平反。她为父亲平反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右派改正，第二恢复党籍，第三争取承认学术成果。

落实政策后，母亲的工资恢复到了60元，增加工资的当月正好放暑假，母亲毫不犹豫，拿出30元买了一张从重庆到北京的火车票，她要去北京为父亲平反。



母亲到了北京，找了教育部副部长，是历史上跟陶行知有关系的人，提出孙铭勋应该平反。那位副部长很不理解，回答：平反，应该是从上而下的，怎么会由家属自下而上的来要求？我母亲见他不支持，就另外找人，找了楚图南。楚图南写了张条子，让母亲回到成都找人。这样，

（孙铭勋的妻子邝忠龄）母亲不停地奔波，在重庆、成都分别找人，常常在星期日大清早去坐在人家门口，人家一开门就进去谈问题，终于争取到父亲右派改正第一批见报。

然后要求恢复党籍。她并不是觉得中共有多么伟大光荣正确（以参加为荣），而是认为既然你整人错了，就得承认错误，就得平反。

父亲的党籍也恢复以后，母亲的第三个要求，是要求从中共党组织的角度，承认孙铭勋的学术成就。她提交给组织的书面意见中说：“孙铭勋在教育理论上的著述，在国内是有一定影响的，各大图书馆都保存有他的著作，各师范院校教育系和学前教育专业在授课中仍引用他的话。在平反结论中，这方面只字未提，我认为是个缺憾。”

这时正在筹备成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陶研会的领导对我母亲说，学术方面的工作，你自己来做，你给孙铭勋写个小传，为孙铭勋出一本教育文选。我母亲又开始到处收集资料，给父亲写了七千字的小传，编辑出版了《孙铭勋教育文选》。

文革结束时，我们家中没有一张父亲的照片，没有哪怕是一张纸条的父亲手迹。我母亲找到中央美院的版画系主任、伍必端教授，为父亲画了一张像。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家中对父亲的纪念，靠的就是这张画像。

母亲在她退休前后，先后主持了好几届“小学生活教育整体实验班”。不过，母亲所实践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仅仅只是在方法论的范畴内，仅仅是“教学做合一”的试验，陶行知早期在晓庄时期的那种深刻的、广阔的社会改革的意义，基本上没有了。而且仅仅是教学方法的实践，也很难有突破。

母亲坚持要与父亲合葬，这是她自己买下的公墓，并且亲笔写下碑文。

中国当代教育家缺席，与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是一致的。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大师要靠教育家去发现，去培养；教育家都没有了，哪里还能出大师？

2014年6月2日

【述往】

## 夫妻年年盼鹊桥

——忆我的同事康翊和傅凤华

津平

我要讲的是一对恩爱夫妻的悲惨故事。男主人公叫康翊，女主人公叫傅凤华，都是我的同事。

老康解放初期是个中学生，一味追求革命，抗美援朝时参加了志愿军，在朝鲜多立战功，并加入了共产党。战争结束后，他在1954年以调干生的资格进入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时年二十二岁。北大一般的调干生学习都比较差，但老康不同。他天资聪明，有学习语言的天赋，各科成绩在班上都名列前茅。像他这样“又红又专”的同学，毕业后肯定前途无量。但他喜欢独立思考，遇事总要问个为什么。在批判胡风肃清反革命运动时，他有些不理解，但考虑到自己是党员，终于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到1957年反右时，他反对给响应毛主席号召对党支部和个别党员提意见的同学划右派。这回可好，你不同意给同学划右派，那你就是右派。他就这样戴上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被留校察看，并开除了党籍。

这时他已经有了女朋友，是北京另一所大学的学生，就是我们故事的女主人公傅凤华。傅没有因此看不起他，而且因为他能主持公道，对他的爱情之火更为炽烈，仍打算等她毕业后就与老康结婚。联想到当年政治上的高压，人人对右派避之唯恐不及，能有这样的女朋友是多么不容易呀！

辗转到了1960年代初，由于饿饭政治上有所放松，老康的右派帽子也摘了，但被贬到东北某地当小学老师，（俄语没用了），傅凤华则被分配到北京戏曲学校做文化课教师。这时，他们俩人结婚了。

短短的婚假以后，老康回了东北，傅老师则开始了漫长的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努力。后来，当我和傅老师成为同事，她告诉我，在那段时间里，她不知找了多少次学校领导和北京市人事局，都不能解决问题。一次，在市人事局，办事人员竟说：“你爱人是右派分子，不能调入北京。”傅说：“他已经不是右派，摘掉帽子了。”那位办事人员说：“摘掉帽子还是右派，只是‘摘帽的’右

派而已。”一时气得傅说不出话来。

从此，盼星星、盼月亮，就盼恩爱夫妻能到一起。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1965年，问题有了转机。傅老师答应了她离开北京，换取夫妻都调到第三地——唐山，这得到了北京人事局的同意。那时，唐山市教育局的负责人，找到与他有特殊关系的高教部的负责人，声称唐山极缺中学教师，不补充人就开不了课了。于是，数以百计的北京和外地的大学助教和中学教师被调到唐山，仅当时我所在的唐山五中就来了十多位。其实，当时唐山并不缺中学教师，调来的人没法安排工作。那位教育局干部只是想利用关系储备些中学教师而已。傅老师就是这样调到了唐山，当然也失去了北京户口。但东北那边老康的领导忽然变了卦，说老康是小学老师，不宜调到中学，还需再考察一下。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这样出尔反尔，不讲信用的。傅老师听到这个消息被气哭了，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她只好在唐山再跑上跑下争取快点把老康调来，就是教小学，也可以在唐山教嘛。

她又跑了近一年，刚刚有点眉目，就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得，一切服从革命需要，“人事冻结”，傅老师白白失去了即使在现在也很重要的北京户口。而且祸不单行，康老师因为右派问题又被“群众专政”，连一年两次的寒暑假也不能团聚了。

这时，他们只有干认倒霉了。从文革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不用说他们，就是两个“红五类”，也不敢在这时提出工作调动问题呀。这样一等又是五年。1971年林彪事件后，政治上有些变化，群众都没有当年的革命热情了，夫妻分居问题又可以提出来了。而且就我们小小的五中，分居问题就解决了七八对。有的老师调到配偶所在地，比如天津、广东、山东等地，也有配偶调到唐山的。可傅老师的问题总是得不到解决。她托关系，找门子，送上“炸药包、手榴弹”（指点和酒），整日团团转，又忙活了好几年（同意傅、康调到第三地的是文革前的领导，文革后已不算数，一切都要从头来。而且那时的当权者腐败之风日盛，不送礼，没有关系是办不了事的。谁说毛泽东时代的官员清廉！）。

据傅老师说，她的事直到邓小平出来辅政后才稍有转机，但又跑了一两年。不知送了多少礼，托了多少人情，直到1976年初，终于把老康盼来了，他被调到唐山市东矿区的中学工作（听说，北大毕业的牌子也起了点作用）。

这个喜讯着实让傅老师高兴了好一阵子，不仅她，我们作为同事也为她高兴。

老康来唐山前，我们几个傅老师的好朋友帮她粉刷了房子，买了必要的新家具。终于等到了老康来，我们还补喝了他们的喜酒。大家想，总算苦尽甘来了，当时虽然物质生活差，工作又累，但夫妻恩爱，日子也过得其乐融融。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半年，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傅老师不幸在地震中遇难，而康老师和他们的女儿侥幸存活。盼了十多年建立起来的家瞬间就破碎了。我记得地震后十天我由北京回到唐山（那时正值暑假，我回家度假幸免于难），老康总是眼睛发直，不哭也不说话。那时时兴所谓“重组家庭”，别人给他介绍因地震丧偶的女性，他一概不理，至今仍然孑然一身。

今天是唐山地震 35 周年的日子，亦即傅风华 35 周年忌日，写下以上文字以为纪念。

2011年7月28日夜

【述 往】

## 插队的那些事（一）

朱 特

### 从大槐树下出发

40 多年前的前铁 3 号——京城一所普通的大杂院——里，曾有一棵百年国槐。据院里的老人们说，这所不起眼的宅子曾是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花房，这棵国槐也许就是这位公公当年手植的。大杂院里挨挨挤挤地住着十余户人家，还有三四十个从高中生到小学生的孩子。国槐巨大的身躯顶着浓密的枝叶，如同一把硕大的伞，在炎热的季节为大杂院的孩子们遮挡出一块阴凉爽快之地。1968 年的八九月份，正是京城暑热难消之时，生活在大杂院里的中学生们每天晚饭后都照例聚集在大槐树下，谈天说地侃大山，交流着各自学校里的趣闻轶事，发布着从各种渠道得来的小道消息，还有各种各样的马路新闻。

此时，京城里的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文革的主战场已经从中学转移到了高等学府和工商企事业，离中学生们越来越远了。红卫兵的伟大统帅似乎把他的文革急先锋忘记了，曾经的“革命小将”——最先把京城搅得一片血腥加混乱的中学生们，在达到领袖的政治目的之后已经失去了作用，就像一根打狗棒子，狗打跑了棒子也就没有了价值，曾叱咤京城的革命小将们被他们的红司令晾在了一边。但精力充沛的小将们却不甘寂寞，在京城各个角落里制造着各种事端，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存在。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新群体：顽主。这些人以十六七岁的初中生为主。他们讲求江湖意气，也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气，还有对不平等而生的怨气，更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杀气。他们或游逛于京城的各个公园，或啸聚于闹市或隐匿于小巷，两伙人碰到一起也许一个眼神一句话就会大打出手。因斗殴死伤人的消息时不时地回荡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一时间顽主的名声大震，人人皆有谈虎色变之态。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中学生们似乎成了城市里多余的赘物，让管理者头痛。

如何处理这些当年的“人物们”，提到了当政者的议事日程。如今专家学者在讨论上山下乡时多从政治经济大处着眼，自是不错。但我以为彼时的管理当局如何化整为零，把这些无书可读无学可上无业可就的城市中的不安定因素消解，也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当年京城中学生里的风云人物，引领知青上山下乡潮头的高中学生曲折，在一次北京市知青安置会上，看到市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站起身来，双手抱拳，作揖请求各省再多要些人，并说“求求在座各位了……”这场景、这番话，让曲折感到了曾经的革命小将们被当作“剩余劳动力”“处理品”被拍卖的深深的悲哀。把“小祖宗”们赶紧打发出城，正是管理者的心态。

大约从那年的春天起，京城里的学校就开始了上山下乡的宣传。大槐树下陆陆续续传来中学生们去东北兵团和内蒙古大草原的消息。我所在的北海中学，春天里走了几个去东北兵团的知青，学校开了全校的欢送大会。那哥几个站在台子上面披红戴绿好不神气，让我等也好不羡慕。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宣传的力度越来越大，气氛也越来越浓烈。

有一段时间，天空中飘浮的电波里传来一个叫吴小明（音）的女生的声音。她在电波的那一端，眉飞色舞声情并茂地讲述她在草原插队的生活，既浪漫又有趣。当她说到因为不会做饭把粥都熬糊了，受到了大槐树下中学生们们的嘲笑。同院的发小阿生说，连粥都熬糊了的人就该到乡下去。

8月底9月初的大槐树下的议题，最多的就是关于上山下乡的事。京城各个学校都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动员工作。而且官方的说法是上山下乡是中学生唯一的出路，留在京城就是不革命的表现，休想分配工作！那口气可是斩钉截铁呢。一天晚上，阿生说那个整天在电波里发声的吴小明到他所在的四中现身说法去了，大谈到草原的收获。他还带来了学校动员毕业生们到农村去的消息，内蒙古的什么旗来的人到学校作了报告，那地方挺好的。我听了心中一动。

宣传的力量其大无比，头羊的榜样魅力无穷。从小就接受“听话”教育的我，早就被那些罩上革命光环的喧嚣忽悠得在内心深处编织出一个青春的梦。我想插队去，当一个建设新农村的革命者。离开絮絮叨叨的妈妈，不再忍受父亲的呵斥，或许也是我“离家出走”的另外一个原因。

9月4日晚饭后，大槐树下照例是一群秃小子们聊天。我突然对阿生说：咱们一块去插队吧，我和你随你们学校走。阿生是大杂院里最有出息的孩子，做事

沉稳，为我所佩服。旁边的二子听见了，也兴奋地说我也去，咱们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二子也是四中的学生，不过他比我和阿生小，是刚刚就近分配入学的在校生，算年头他明年（1969年）才毕业呢，还轮不上他上山下乡。这时绰号叫刘巧儿的发小听见了我们的对话，也凑上前来报名上山下乡。刘巧儿从小就寄居在大杂院的姥姥家，因为姓刘，大槐树下的孩子们就把这么一个女性的外号给了他。就这样，在大槐树下我们4个人说好了一块去插队。阿生是六六届，我是六七届，刘巧儿是六八届，二子是六九届，4个人占全了文革兴起后滞留在校的四届初中生。因为我和刘巧儿不是四中的学生，还需要转学籍，这事就托给了阿生。一件涉及人生的大事就让我如此轻松作出。多少年以后，阿生对人说，他的插队是被我拉下水的。

第二天，阿生带回的消息是转校不成问题。我大喜，立刻跑到学校找到军训的解放军团长说明情况。团长二话没说，立码给我写鉴定封档案，让我自己拿到四中去。临走，他说了一句：我可没有给你写什么坏的事呀。这话让我惦记了许多年，每每想起就想知道这位我不待见的团长究竟给我写什么操蛋内容。多少年以后，当我重返京城，由体制内变成体制外的人员后，在办理社保什么手续时，北京某人才中心的工作人员把一包厚厚的档案交给我，让我自己整理自己的档案。那时我最想看的就是军训团长给我写的鉴定。没有。档案里只有中学时期我自己填写的登记表，关于文革的鉴定片纸皆无！后来一想，这定是四中的老师给我撤掉了。她是阿生的班主任，大名石磊。好人呐。

学籍转成，我向父母公布了我在大槐树下作出的决定。母亲一听就慌了神，眼泪也流出来了，极力劝我缓行。鬼迷心窍的我想的只是远走高飞，对母亲的眼泪不为所动。父亲却什么也没说，这位平时对我动辄申斥的严父，只是默默地为我打点行装。

第三天，我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转户口。户籍民警不出10分钟把手续办清。这我和后来重上京城户口时相比麻利多了。真是别时容易回时难。

刘巧儿没有走成。他的学籍转了，京城的户口也销了，但姥姥那里闹翻了天，寻死觅活放出狠话不让刘巧儿离开京城半步。乖孩子刘巧儿听了姥姥的话，半年后他被分配到首钢公司当了一名产业工人。我除了佩服姥姥有先见之明外，心中也恨恨：不是他妈的说赖在京城里的学生都不分配工作吗！

9月9日是离开京城的日子。午饭后，我、阿生和二子告别了大槐树来到了四中。起风了，扬起的尘土让人无法睁眼，西北的阴云也随着风罩住了京城，天空变得阴沉沉的。刚上送站的大巴，天空就落下了雨点。汽车没有直接开到北京站而是到了天安门前停住了。这时密密麻麻的雨点下得正急，偌大的广场上白茫茫一片很少有人影。不知谁发给我一张纸片，一看，上面是誓词。我明白这是让我们对着天安门宣誓呢。雨正大，领头的说就在车上吧。念誓词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庄严感，特想哭，望着天安门城楼上没有表情的画像也特激动。这世上不知有多少誓词成为了笑料。当然这是后来悟出的。

来到北京站，雨过天晴，热烘烘的太阳又出现在西边的天际上，阵雨带来的凉爽很快就消失了。车站里人头攒动，还有一拨人敲锣打鼓制造着热闹的气氛。许多年以后想起车站的场景，总是和屠宰场联系起来。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办法，它总是出现。

知青诗人食指曾有一首诗，说是运送知青的列车在4点零8分从北京火车站开出。我记得送我们的这趟列车也是下午4点多开出的。为了确切知道发车时间，我找出了当年的乘车证。在那张长方形的小纸片上写着：“第4车厢29号，68年9月9日”。惟独没有发车时间。我注意到了纸片上的那枚圆形公章，40多年来我从没有正眼看过它，不知道这枚公章代表着哪一级机构。这次我仔细地端详了它，公章上部呈半圆形排列的字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西城区招生分配就业领导小组”，公章中部横向排列的字是：“安置就业办公室”。

就这样我被安置在内蒙古高原的雨村就业。

三个多月后，毛泽东发出了知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大槐树下的那些中学生们星流云散，从云南的中缅边境到中苏对峙的黑龙江边，都有大槐树下中学生的足迹。但也有几个坚持到底不为所动的同龄人，留在了京城分配到了工作。他们在京就业，却让我找到受骗上当的感觉。

在我插队期间，曾经枝繁叶茂的大槐树被伐，它的位置盖上了房。大杂院添人增户，更像一个杂院了。大槐树虽然消失了，但它仍存活在我的记忆里。

【资料】

## 胡启立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报告

(1966年6月8日)

同学们，你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真好！搞得对！党中央、毛主席支持你们！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就要学习党的政策。现在形势好得很！一个群众革命浪潮起来了，有冲击一切牛鬼蛇神的劲头，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提高斗争水平。

### 一、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是世界革命的大事。这场斗争从最近几个月来，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在全国迅速展开了。全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号公布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6月3号发表了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群众运动就轰轰烈烈起来了。

为什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因为：

1. 使我们大家看到了我们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复辟，防止政变、颠覆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政权问题，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开始我们很不理解，不认真，不革命。开始有人觉得这是学术问题，后来觉得是政治问题。三家村是矛头指向党中央的毒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有路线问题，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黑线与党中央对抗的问题。这样一个修正主义黑线已经深入到党的机关来了，深到北京市委来了。《北京日报》表面上是党的报纸，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已经钻到领导地位中，已经夺权了。我们不夺，他们就要夺了；你不吃他，他吃你；你不杀他，他杀你。这个问题首先是个阶级斗争。有的同学看不到，觉得有那么严重吗？只是动动笔，用用墨水。有的中学生说，《燕山夜话》我也看不懂，有那么严重吗？实际上，在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存在着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毛主席在领导我们进行斗争。前一阶段才子佳人占领了我们的舞台，打进党内的一小撮人利用职权为他们的东西大开绿灯，说：“早春

二月”、“阿诗玛”是最好的彩色片子。宣传阵地也被这些人占去了，他们宣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有人看了“伟大的空话”就不信党的话了。看了“生命的三分之一”，就想成名成家，个人奋斗。有人看了“海瑞罢官”，就说：为什么大地主还出这么好的清官？“可见，不见得大地主都坏。”他们否定了我们的阶级分析。在教科书上宣传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像居里夫人，有人就觉得居里夫人是为全人类服务，而共产党只为劳动人民服务。因此居里夫人比共产党好。这就是让人走只专不红的道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思想基础。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生产关系是基础，但这要靠政权，失去了政权就失去了一切。这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在胜利前有人很清楚，胜利后就觉得政权不成问题了，要搞建设。要知道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这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夺权的方法一种是武装进攻，一种是用笔杆，搞和平演变。过去资产阶级搞革命时先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然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搞革命，也是要首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然后打倒敌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夺权都是先从思想上下手。资产阶级集中一条，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总路线、大跃进、教育路线……企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实现资产阶级复辟。“三家村”本身的含意就是反动的，虽然他们表面上谈的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都有其政治目的。经过这次斗争，揭露了一切牛鬼蛇神，用毛泽东思想这个照妖镜把资产阶级权威照出来。我们最大的胜利是党中央、毛主席改组了北京市委，这是挖掉了埋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在首都，在北京，不挖出这颗定时炸弹怎么成？这是主席的英明决策，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2. 阶级斗争。我们斗争的发展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在旧中国那些反动派被打倒了，财产被没收了，但他们的思想没收不了。他们虽然人口少，但政治上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能力比人口比例要大的多。我们在城市里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1）而且还无时不刻不在生长着新型的资产阶级分子。（2）由于我们建设迅速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扩大，因此混进了一些资产阶级分子。（3）在国家机关中还有蜕化变质分子。（4）帝、修包围着我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搞复辟，搞“和平演变”。（5）解放后对旧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其中有人拒绝改造，有人正在改造之中，有人根本没有改造。他们还占据了一些领导地

位。因此，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斗争还是长期、曲折、复杂的。我们拿枪的敌人比较能看出来，对于不拿枪的敌人，他们对我们采取蚕食，进行渗透。有人觉得没什么，不大认识这个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对资思想我们也绝对不能“和平共处”，对这个问题我们警惕不够。披着羊皮的狼比不披羊皮的狼要狠毒十倍，打着红旗的敌人要比打着白旗的敌人狠毒十倍，认识不到就要中毒，就要不知不觉被吃掉。这是最危险的。

有人说：真理没有阶级性，马列主义是有阶级性的。这就是说马列主义不是真理，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方面谁胜谁负，还未真正解决。这是客观的阶级斗争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我们要不注意这一点，就要上当，就会出现裴多菲俱乐部。真正的共产党员，毛主席教导出的青年决不可和资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处。我们要斗争，斗争是合乎规律的，是件好事。它会使我们党和国家更加健康，更加发展，更加团结在党的周围。日本人讲：“中国七亿人都是批评家”，这是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永远革命的重大的根本性的措施。它将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飞跃发展，将预示着出现新的大跃进。这是我们革命青年欢欣鼓舞的。一切革命青年都要举起双手欢迎这个大革命，参加这场运动，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 二、我们的目的（即斗争目标）

斗争目标是什么？毛主席说：“教育要革命，学制要改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了达到此目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市的中学中，都应这样要求：一切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集中揭发和批判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及其在学校中的影响，挖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挖掉学校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挖掉学校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权威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清理领导核心。属于一般教学改革问题下一步解决，揭发当然欢迎。

怎么理解这个要求，解释如下：

1. 要集中目标，而不是分散目标，揭穿批透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教育黑线。挖掉学校中的资产阶级权威和资产阶级在党内代表人物的斗争是领导权问题，应首先是解决此问题。要求运动集中，而不是打倒一切。对于知识分子分成三类。

(1)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2) 普通知识分子——即世界观未经根本改造，仍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但在政治上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领导。(3) 革命的知识分子。这是依靠的对象。我们这次运动重点是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及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代表人物。这样便于我们集中目标打痛打狠我们的阶级敌人，第二类知识分子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当然会放毒，要痛驳痛揭，揭臭。要批判，要改造。但运动重点不在于此。我们一定要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我们要对着一小撮人，不然面积很广，就会把真正的敌人放跑了。

2. 弄清性质：这不是一般的斗争，而首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我们要抓政治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不要把斗争降低到某人作风问题，这是教育权的问题。教育界中确实问题较多，主席的号召一直受到抵制，贯彻不下去，这说明教育界有黑线。原北京市委存在着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以北京大学为代表，他们不管是在教育领导、教师队伍、阶级队伍、宣传教育等各方面存在着黑线，对党的号召阳奉阴违。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否则就不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3. 要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师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是一小撮人。在斗争中我党的根本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多个击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总是极少数。北京地区 95%的人民和干部都是好的，有些人犯了错误还可以改正，必须善于区别对待，才可以把最坏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只有这样他才害怕，否则他不会孤立，害怕。对犯错误的人，主席讲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又讲：对那些犯错误还可以教育过来的党员，干部同犯了错误不可救药的分子加以区别，对愿意改正的，允许改正错误。假检讨不怕，假的可以看出来。我们不要因为几个人的假检讨，就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假检讨。有假的不怕，群众发动起来就可看出，现在看不出来，将来也能看出来。不能因此而不允许犯错误者改正错误。

### 三、我们应采取的态度和方法

首先，一切真正愿意革命的师生都要用自己的革命行动站在运动的前面，拥护这个运动。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革命。一切压制革命，不许革命都是有错误的。不能采取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指手划脚的那一套。不许反对贴大字报，贴大

字报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表现。

现在北京市的中（学）形势很好，一天之内，大字报贴得满墙，都起来了，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要抓住机会解决学校黑线、领导权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文革，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1. 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才能把文革进行到底。没有党的领导是盲目的。加强党的领导是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怎样加强党的领导？首先要学习党的政策。要把学习主席著作、党的政策与揭发、批判结合起来。这个斗争是严肃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学习党的政策，武装起来，提高水平，才能发现敌人，找出黑线，彻底揭发。要用主席思想武装头脑，把运动变成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过程。把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6月1号《人民日报》的六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作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作资产阶级保皇派？”及6月6号的宣传教育要点，这是指导我们当前运动的行动纲领。这样就不是盲目的，而是在中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的。

我们要学习调查研究，占有材料，加以研究分析，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学习革命，不断提高斗争策略，方法，要自觉地去。有无产阶级义愤思想很好，非常必要。但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光靠激昂，表决心还不够，要揭发材料，抓他们的要害，不然他们不害怕。要进一步提高斗争水平，这不是轻松的，要有相当一段时间进行斗争。

2. 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的师生组织起来。学校里可充分利用师生代表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执行党的政策。若原党支部问题性质不清，可否在它领导下？李雪峰同志说：只要上级党委不宣布撤销这个党委，这个党总支就要领导。又在他的领导下，对揭发他这不矛盾吗？因为真正的反党分子只是极少数。北京市委还有一些继续留下做工作，这是要一分为二的。可以依靠革命力量进行领导，现在党总支是在新市委的领导下，和旧市委根本不同。这个市委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派的，非常重视中学文革，派了工作队帮助各单位进行文革。这个工作队与北大的不同，是帮助原党领导文革的。

3. 斗争中要学习调查、研究、占有材料，分析性质，分清两类矛盾，认真，

严肃地进行这场斗争。性质不清楚，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判断是什么性质。我们的目的是要肃清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影响，挖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不能从数字看问题。有十个抓十个，抓九个都不行。

4. 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破坏。防火、防盗、防特，特别是防火。有坏人活动，是因为群众发动得不彻底，真发动起来，坏人就没有活动余地了。

5. 大字报很好，毛主席历来提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大字报对无产阶级有利。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从不隐瞒自己的错误缺点，是光明磊落的。不害怕公开承认自己的缺点。牛鬼蛇神是从来不承认自己的缺点，一承认就露了原形。在我们国家非常需要发挥这个民主集中制，这是保证资产阶级不复辟的重要措施。在苏联，赫鲁晓夫修了，没有地方党委公开起来斗争。主席讲：“地方修，搞四清，中央修，你们就反对。”

运用大字报要注意：（1）不贴男女关系，私人生活问题。（2）不要贴政治历史问题。这样容易转移目标，把严肃的斗争转到这面。

答复具体问题：

1. 要求已经派了工作队的地方，学校，同学、老师服从领导听指挥。

2. 目前主要是揭发积累材料，分析批判，不要开斗争会。不要捆人，打人，侮辱人。这不可能解决问题。对我们的战斗反而不利。在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这个方法是不能解救问题的。他的书，思想你没批判，他的影响仍然存在，要靠思想上发动群众批透、批臭吴晗、邓拓等。毛主席说：还给饭吃，养老虎还给饭吃。养个反面教员，看到他就想起阶级斗争，从而提高警惕。

3. 支援问题：主要是靠各单位发动群众起来革命，外单位声援不是主要的。如果有必要，去一两个人贴大字报，不要拉队伍去，一般情况就不要去。

4. 调查材料慢，慢先在本校搞，再到外边去，有可能得到假材料。大字报若经师生代表会同意，可成立大字报管理委员会，若你了解那个学校材料，可以揭，非常欢迎。

前天老师报告和今天报告精神一致，但活思想不同，讲的内容也有发展。针对对象不同。传达报告和原报告需要分析，从总的方面，大的方面去辨别。一种是故意歪曲，扣掉不讲，这就是有问题；一种是想传达好，但记得不全。要加以分析，仔细考虑，具体人，具体事。

5. 对工作组采取什么态度：工作组属新市委领导，中学是由团中央派下的工作组，团中央干部属新市委中学工作组，工作要向新市委汇报。如有缺点可提出批评。但工作组的布置、制度、决定要执行。

6. 若老师有问题可否开斗争会。会上有的老师有可能承认，但有的可能辩白。先把材料集中起来，调查研究，搞清之后再开会。材料落实后，就不需要你同意了。

7. 党支部表现是烂了，要不要听他的领导？领导未做决定之前还要在他的领导下。我们要搞有质量的大字报，要有真枪实弹，要分析，要批判。确实够了，要撤；如不够，还要领导。

8. 上课问题：我们的运动是比较长期复杂的，不是一天两天，因此要争取复课，用半天搞运动。根据运动发展不同，恢复一部分，有的课如政治、语文可以用来学文件。

9. 有的问题牵扯到政治历史，那就写检举材料，由组织上调查解决，政治历史的问题非解决不可。

10. 工作组去后是帮助党支部，党支部的意见实际上是工作组的意见，是互相商量好的，一致的，不矛盾。

11. 关于升学考试问题，国务院、教育部正在研究。

注意报告中的方向，总的精神，总的政策。有些具体问题就可解决了。

现在革命形势大好，毛主席讲：青年是最有生气，最革命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北京中学学生没有辜负党的期望，教导。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回答党的期望，教导，将文革进行到底。

摘自《罗洽笔记》

【资料】

## 胡启立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讲话

(1966年6月19日)

同学们：

我刚来学校，不太了解情况，参加了一个班的讨论。我提几点意见：

一、我们女附中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好的，这个革命的群众运动开展的是好的。广大革命师生参加了这个运动。我们要充分肯定这个成绩。我们学校掀起了广大的群众运动，揭发资产阶级在学校党组织的代表人物。揭发修正主义的教学黑线。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是全校革命师生的努力，每个人都不应该在群众运动之外指手划脚地批评。

二、我们学校文化革命的方向怎样？

我们进行的是三个揭发：（1）揭发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黑线及其领导；（2）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3）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内的代表人物。我们师大女附中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其它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一切东西也都要揭露，但有个主攻方向——清理党的领导核心。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前一阶段要进行，后一阶段也要进行。同学们揭发了卞仲耘、胡志涛，他们是要检讨的。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是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因为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影响不是轻的，是重的；不是少的，是多的。比如追求升学率，砍掉政治活动等等。女附中把政治，把学毛选都砍掉了，如果把这个经验推广到全国，那我们要到什么地方了。如果不把这个批深批透，就挖不出来黑根。这个方向首先是解决领导权的问题。结论组织上是容易下的，但思想上不解决问题，换十个校长也没用。这就需要反复批判，学习斗争，不要受各方面的干扰，分散注意力。

三、最近一些同学、教师给工作组提意见，这个行动——监督批评工作组，我们是欢迎的。否则工作组就无法把工作进行到底。无论意见如何，工作组都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错误就改正。应当说工作组是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工作组是否处处都合乎毛泽东思想？这不一定！因此工作组现在欢迎批评，将来也仍然欢迎批评。对工作组的意见有争论，应采取

分析的态度，不要笼统统统，要加以具体分析。

如果说“给工作组提意见就不对”，那就不对了，但是绝大多数同学不是这样的。工作组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如果反对工作组就不对，也就不对了。我们允许不同的意见发表出来，这不是坏事，如果说同学们的意见完全一致，那就缺乏阶级分析了，怎样对待争论？（1）态度：正确的、错误的话都要听，都要等人讲完（二十三条中规定），然后把各种意见摆出来，进行争论。（2）方法：抓大是大非，不要抓小是小非。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但一定要抓大是大非。大的方向、原则我们应当也必须取得一致，否则我们就不能进行文化革命。小是小非的问题不一定能取得一致，也不一定都能辩论。（3）在辩论中，我们不要过急过早地下结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解决问题，统一思想。对于同学中的大是大非问题都要进行争论。

我们要革命的团结，不要调和的、和稀泥式的团结。错了就改正。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讨论。讨论中间，现在会发生，将来也继续发生分歧，我们对此采取主席分清两类矛盾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就要压制，吃掉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团结—批评—团结，以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

希望我们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将运动推进一步，要有主攻方向。

摘自《罗治笔记》

## 【读者来信】

## 1. 樊建政纠正 114 期来信之误

《记忆》编辑部：

《记忆》第 114 期刊载的笔者关于《记忆》第 113 期金光耀老师的大作《文革风云现纸上——读〈复旦大学大字报选〉》三处论述的一点商榷的文字，虽经笔者反复斟酌、修改，但仍然存在一处重大笔误：“‘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另一说，据马立新回忆，成立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三日），简称‘红上司’”。现郑重纠正，改作：“‘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另一说，据马立新回忆，成立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三日），简称‘上三司’。一九六六年年底，‘上海市红卫兵革命司令部’内部分裂，始有‘红三司’的称呼，他特指安文江为首的一派；而另一派以上海戏剧学院赵全国为首，则自称‘上三司’”。

这里特向金光耀老师的斧正深表谢忱，并向《记忆》读者致歉。同时，借贵刊宝地，后辈晚学向金光耀老师等在文革研究方面长期以来的无私奉献深表谢忱和由衷的敬意。

樊建政

2014年6月16日

## 2. 章铎谈《北京大学大事记》的出处，及114期的两处误植

《记忆》编辑部：

《记忆》第114期“北京大学1966年大事记”一文，就是《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的内容，我认为应该注明这一点（2008年版与1998年版比较，新增加的内容有很大的倾向性。这个问题，在上次聚会时我们曾给过与会者材料。当然，这和本期杂志无关）。

另，这期有两处误植：

1. 第80—81页：“1月27日 校党委常（为了推动北大文革历史研究工作的进

行，笔者建议：1. 2. 3. 4. )”……括号里的文字不该出现在这里，这些文字应该是第25页的。

2. 第91页：“6月11日 汪汪箴”，应为汪箴。

章铎

2014年6月16日

【版权声明】

##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mailto: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